



二十世纪全纪录

周丽琼 主编

1957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中央经济工作 5 人小组	1
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1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2
毛泽东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3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5
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	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6
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15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15
青岛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	16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6
“三包一奖”	17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7
武汉长江大桥落成	18
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	18
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9
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	19
刘胡兰烈士纪念碑落成	34
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	38
本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92
李政道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奖	129
小资料	132

世界部分	133
世纪回眸	133
国际偷渡公约签定	133
英美科学家完成核聚变试验	137
艾森豪威尔签署《关于美国的中近东政策的决议 案》	139
《罗马条约》签订	140
小资料	142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中央经济工作 5 人小组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同志组成5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中共中央于1955年7月31日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阐明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及党对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论述了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对于工农联盟的基础进行了新的阐述，指出了我国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即将到来。报告强调，我国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因此，合作化必须赶快上马。报告

否定了 1953 年和 1955 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批评主张发展生产合作社要适应群众的觉悟程度稳步前进的同志像小脚女人，对合作化运动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看不到主流，犯了右倾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报告认为，到 1956 年，全国将有 5500 万户，占农村一半人口加入初级社，到 1960 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有更多的初级社转为高级社。

在报告中毛泽东对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把邓子恢坚持中央原订的发展计划的意见，斥为“右倾经验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新的农业合作社发展步骤：1958 年春季，全体农业人口的一半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到 1960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60 年以后，逐步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到农村党支部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到 1955 年 10 月，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春季的 65 万个猛增到 129 万个。

这次会议，引起了全国范围批评右倾错误，把党内 在合作化时间与步骤上的不同意见作为右倾思想来批判。这次会议助长了党内的急躁冒进情绪。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2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 1957 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 1956 年巨大的进

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毛泽东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处于历史上重大转变时刻发表的。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当前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在政治上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方针。

毛泽东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

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他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明确提出了必须严格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及方针政策，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讲话。发表前毛泽东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由于在个别段落中增加了某些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因而使得有些提法与全篇的基本论点不够协调，但并不影响这篇著作的重要价值。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党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

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 1%到 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召开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 1493 人，列席代表 70 人，代表着全国 92 万个基层团组织和 2300 万团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许多党和国家及有关部门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开幕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大会听取并通过了胡耀邦所做的《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报告。报告在总结过去四年来团的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共青团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即团结和教育全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完成党的八大所提出的

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历史任务而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我国青年的任务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就是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即“劳动、学习、团结”六个字的方针。报告阐述了青年团应该善于代表青年利益，采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加强团的建设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部长陆定一以老共青团

员的名义向大会祝贺，并阐述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題。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做了题为《勤俭建国》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举产生了由149名中央委员和6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25日下午，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中央负责人接见了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接见时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

共青团三届一中全会1957年5月26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的有中央委员11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全会选出了胡耀邦等19人为团中央常委，胡耀邦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刘西元、罗毅、胡克实、王伟、梁步庭、项南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1958年1月7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54人，306位中央和地方的团干部列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到会做了重要指示。他说，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成为青年的领导核心，应当以身作则。共青团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搞的，这就叫正规化。在这个正规化之内，共青团是青年的领导核心，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就不妥当了。胡耀邦代表团中央常委会做了《共青团1958年的任务》的报告。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决定》，定于1958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全会号召团的干部努力做到“四要四不要”即：不要个人主义，要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要骄傲自大，要提倡谦虚谨慎和自我批评；不要空洞浮夸，要做到切切实实，深

入工作；不要消极懒惰，要发扬生气勃勃，勤学苦干的精神。

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 1958 年 6 月 2 日至 8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历时 73 天，是青年团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预定议程是交流“大跃进”以来共青团工作的经验，通过《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讨论少先队和少年儿童工作。但是在会议进行期间，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转入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保证党对团的绝对领导”问题，因而会议一再延期。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少先队工作，开展共产主义少年儿童运动的决议》、《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的总结》等文件。全会提出“共青团必须无条件地全面地服从党的领导，这是团的工作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全团干部一定要发扬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朝气蓬勃，敢想敢做的作风，胜利地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全会号召全国青年开展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并决定出版适合青年阅读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选本。但是在会议中检查保证党对团的绝对领导问题上，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把局部问题当全局问题，把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以至对团中央书记处个别成员做出了错误的处理决定，给团的工作造成了某些消极影响。

共青团三届四中全会 195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团中央委员 86 人、候补中央委员 34 人。会议主要议题是根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精

神，总结 1958 年团和青年工作的经验，讨论 1959 年共青团在工农业生产和组织青年学习方面的任务和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动员全国青年为实现 1959 年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而奋斗的决议》和《关于积极组织青年业余学习的决议》。3 月 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对团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做了总结。为使全国青年在 1959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进一步发挥突击作用和先锋作用，全会要求必须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劳动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风格教育；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除发动青年同成年人一起完成各种任务外，还要组织青年进行各种必要的突击活动；要以极大的热情组织青年学习，达到学习、劳动双丰收；团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更加生动地开展工作。

共青团三届五中全会 1959 年 7 月 13 日至 18 日在山东青岛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119 人，列席会议的团中央和团省市负责人 10 人。会议听取了胡耀邦代表常委会做的工作报告，着重讨论了发动青年投入增产节约运动和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农村团的基层组织在青年中的核心作用的决议》。全会要求团组织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根据青年特点因地制宜地大搞生产活动，要在全团和全国青年中进行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教育，采取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进行思想工作，关心青年业余学习和文化体育活动，促进青年全面成长，把健全基层组织，加强基层工作作为团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全会还要

求团的干部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和唯物辩证法武装头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 1960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4 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106 人,列席会议的有团的省、自治区和地、县负责干部 76 人。全会总结了 1959 年的工作,讨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决定 1960 年全团的工作任务,通过了《关于发动广大青年在全民的技术革命运动中发挥更大的突击作用的决议》。全会认为,全团的中心任务是:在党的密切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继续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更大地提高全团和全国青年共产主义觉悟;大力开展以技术革命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为实现 1960 年社会主义建设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全会还批准了团中央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工作规划。全会增选了 12 名团中央常委会委员,增选了杨海波、张超、李琦涛、王照华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路金栋、曾德林为候补书记。

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 1962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9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108 人,列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各部门及团的省、市、自治区和地委的负责干部 75 人。会议讨论了国内形势,任务以及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健全团的日常工作,学会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谭震林、候补书记杨尚昆等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最后通过

了《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和《共青团中央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主要谈了四个问题，一是继续改进思想教育问题；二是积极参加对各类青年的就业和学习要求的安排问题；三是培养青年的民主集中制的观念和习惯问题；四是认真健全团的基层组织问题。在《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中，谈到加强农业战线的意义以及怎样对待前途、困难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团中央提出希望：

1. 好好劳动，当个好劳动者；
2. 和当地干部群众加强团结，搞好集体经济；
3. 虚心向农民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向老农学习；
4. 把学到的政治、文化技术带到农村去，并在农村继续坚持学习，使自己得到不断提高。

共青团三届八中全会 1962 年 12 月 20 日至 1963 年 1 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团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列席的人员共 159 人。全会进一步学习和领会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听取了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的报告；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和当时青年团的任务；讨论了加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特别是阶级教育问题；研究了团的建设问题。全会通过了《关于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召开团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指出，当时中国青年的迫切任务是和全国人民一道。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争取当年农业丰收、国民经济的新高潮而斗争。

共青团三届九中全会 1964 年 6 月 5 日至 8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79 人、候补中央委员 32 人，列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省、市团委书记

记 33 人。这次全会主要是为即将召开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会议讨论了将提交团的九大审议的工作报告(草案)、团章修改草案和修改团的章程的报告(草案)以及其他事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第三届团中央全会文件

1.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毛主席所作的指示

(1957 年 5 月 25 日)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的祝词

(1957 年 5 月 15 日)

3. 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1957 年 5 月 15 日)

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

(1957 年 5 月 25 日通过)

5.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1957 年 5 月 24 日通过)

6.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

(1957 年 5 月 24 日选出)中国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

1. 共青团 1958 年的任务

——共青团中央常委会向三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

(1958 年 1 月 8 日)

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二中全会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决定

(1958 年 1 月 20 日通过)

3. 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公报
(1958年1月31日)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
 1. 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三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
(1958年9月4日)
 2. 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
(1958年6月28日通过)
 3. 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中央关于改进少年先锋队工作的报告
(1958年8月9日)
 4. 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关于改进少年先锋队工作开展共产主义少年儿童运动的决议
(1958年6月28日通过)
 5.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
(1958年6月28日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通过)
 6. 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公报
(1958年8月21日)共青团三届四中全会
 1. 共青团三届四中全会关于动员全国青年为实现1959年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而奋斗的决议
(1959年3月6日通过)
 2. 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公报
(1959年3月17日通过)共青团三届五中全会
 1. 共青团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强农村团基层组织在青年中的核心作用的决议
(1959年7月18日通过)
 2. 共青团三届五中全会公报
(1959年7月25日)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

1. 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工作规划

(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 1960年3月4日批准)

2. 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动广大青年在全民的技术革命运动中发挥更大的突击作用的决议

(1960年3月4日通过)

3. 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增选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

(1960年3月4日)

4. 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公报

(1960年3月11日)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

1. 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当前任务的决议

(1962年7月9日通过)

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给走向农业战线的团员和青年的一封信

(1962年7月9日)共青团三届八中全会

1. 中共中央批转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共青团三届八中全会情况的报告》

(1963年2月3日)

2. 共青团三届八中全会关于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

(1963年1月11日通过)

3. 共青团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团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1963年1月11日通过)

4. 共青团三届八中全会公报

(1963年1月19日)

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败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6月1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国家决算和1957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了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

划主要指标。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召开的，在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气氛。

青岛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

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夸大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会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9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

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三包一奖”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进行整社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调整社队组织，统筹安排社员的劳动和收入，改善生产管理。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此以前，有些农民群众自发地在合作社内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快即受到批评制止。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

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武汉长江大桥落成

10月15日,工程浩大的武汉长江大桥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于本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

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代表团在访苏联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

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

1953 -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经济经历了从以农民个体所有制向农业合作社所有制过渡的经济体制变革，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政府实行了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3 - 1957年间，我国完成了从多种经济成份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以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体制的过渡。农村经济从以农民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家庭经营，向以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制为基础集体经营的转变。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与此同时，政府实行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大力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本文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初步的分析：

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

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目标。鉴于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国际形势，借鉴苏联的经验，工业化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为了满足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重工业发展对资金积累的需求，在经济体制上，选择了以排斥市场商品交换关系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上用高度集中的计划机制逐步取代市场机制。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1953年11月就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 and 矿区人口增加过快，为满足轻工业所需要的对棉花及其他农业原料的需要，农业中工业原料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农村缺粮人口迅速增加，从而使粮食销售量增长过快。粮食收购量增长速度赶不上销售量的增长速度。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使国家能以粮食生产供应匮乏的情况下，以较稳定的价格收购粮食，以保证城市和工矿区人民的粮食供应。这对稳定当时的市场物价和安定社会秩序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家通过这一政策，垄断粮食的收购，全面掌握了流通领域的主动权，起到了促进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初期，农民在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销售。1956年10月开始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但是，在1957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凡属

国家规定计划收购的农产品，如粮食、油料、棉花不开放自由市场，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实践证明，这种切断农民与城乡市场联系，完全排斥市场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束缚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育与成长，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五"时期，在农村全面开展了农村合作化。在初期，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个方面；强调一切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坚持自愿互利和循序渐进的方针。在生产领域，农业互助合作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围绕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并从实际出发，创造了不触动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组织形式，经过实践检验，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1953年底，全国兴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952年底的3600多个，增加到14000多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上述正确方针和组织形式，并没有贯彻始终，1954年以后，加快合作化进程，5月，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合作化运动不仅应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也应该当作生产运动的中心，偏离了原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稳步前进的方针。一年内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4000多个迅速增加到1954年底的48万个；1955年春季更增加到67万个。到1955年夏季，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农业合作化进程发生了不同意见，把原来正确的方针，当作“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来批判。这样就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猛烈浪潮。到1955年10月底，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到127.7万个，入社农户3813.3万户的32%。年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迅速增加到 190.5 万个，入社农户 7545.2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63.3%。在迅速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又出现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升级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1955 年 6 月底，全国试办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500 个，参加农户只有 4 万户，不到全国总农户的 0.1%。到 1956 年 3 月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猛增到 26.3 万个，入社农户猛增到 6577.6 万户，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到 54.9%。到 12 月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到 54 万个，入社农户达到 10742.2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87.8%，基本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这样，原来预计 15 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仅仅用了 4 年时间，提前 11 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农民土地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历史性变革。

在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同时，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 1957 年全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社员 15745 万人，职工 168 万人，农村供销合作社收购、批发、零售门市部和供销社、分店、代购代销店等网点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1957 年供销合作社系统共收购农副产品和废旧物资总额达到 60.05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53.1%；销售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总金额达到 95.07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90%。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55 年全国有信用合作社 15.3 万多个，共有社员 6800 余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60%左右，共集股金 17200 万元。当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存款总额 23.31 亿元，余额 6.08 亿元，相当于国家银行农村同期农村储蓄存款余额的 4.6 倍；当年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 8.36 亿元，余额 3.01 亿元，约相当于国家银行同期放款的三分之一。此外农村信用合作社还向国家提供了大

量信贷资金。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形式，并不是从我国农村实际出发，经过试验逐步推广的，它是以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模式，在“高潮”中迅速普遍推广的，因此，它带来了许多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高潮”刚刚过去，许多地方就发生了退社风潮。一些地方出现了改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关系的“包产到户”新的经营形式，受到农民的欢迎。但不久它被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过急过快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同时也错误地过高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些又成为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理论根据，从而导致了更严重错误的发生。

“一五”时期，农村经济体制另一项重要变化是，国家调集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速了国营农牧场建设。1954年先后由军队转业官兵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军垦农场。政府还组织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黑龙江、新疆、华南开荒建立国营农场。全国其它一些省、区也在沿海、沿江、滨湖、滨河、荒山、荒漠以及大城市郊区开荒建设国营农场。到1957年国营农场发展到804个，比1952年的562个增长43.1%；国营农场职工人数增加到44.1万人，耕地面积猛增到105.4万公顷，比1952年增长1.8倍。五年中新开荒耕地86.9万公顷，比1949-1952年间开荒面积增长2.39倍。拥有拖拉机4815台，联合收割机1406台，载重汽车3008辆。1957年全国农垦系统国营农场工农业生产总值4.4

亿元，比 1952 年的 1 亿元增长 3.4 倍。农业总产值 2.7 亿元，比 1952 年的 0.7 亿元增长 3.85 倍。粮食总产量 14.58 亿斤，比 1952 年的 4.52 亿斤增长 2.22 倍。向国家交售商品粮 4.81 亿斤，比 1952 年的 9200 万斤增长 4.22 倍。

“一五”计划时期，政府实行了以下一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1，在实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53 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13.6%。1956 年随着铁路交通的发展，又提高了一些新建成铁路沿线的粮食收购价格，并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实行粮食保护价，每斤粮食不低于 4 分到 5 分。油料收购价格 1953 年提高 12%；1957 年提高油茶籽收购价格 29.86%，芝麻油、油茶价格提高 25%，桐油价格提高 31%。1952 年棉花生产大丰收，1953 年收购价格曾有所下降，1954 年又调整了粮棉比价适当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生猪收购价格 1953 年提高 13.1%，1957 年又提高 13.8%。1957 年与 1952 年相比，粮食类价格提高 17%；经济作物类价格提高 13.2%；畜禽产品类价格提高 39.3%；其他农副产品价格提高 38.1%。”

1953 年到 1957 年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总指数增长 20.2%，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只增长 2.2%。建国初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缩小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缩小。但是，考虑到工业与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仍然偏小，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实行稳定农业税收政策。政务院在《关于 1953 年的农业税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三年内（1953 -

1955年)农业税收指标稳定在1952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1956年和1957年仍继续稳定。同时,还规定实行“灾情减免”或“社会减免”的政策,这样就使“一五”时期农业税稳定在1952年的水平上。1957年全国农业税额为29.67亿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5.5%,比1952年的5.9%,减少0.4个百分点。

国家农业税正税除1957年比1952年有所增加外,其余年份均比1952年有所减少;加上地方附加合计实征数额与1952年比较,除1953年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均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地方附加征收额增加的结果。五年间,全国农业实产量增加1414亿斤,农业税正附税增加84亿斤,占产量增加数额的5.8%。农民农业税负担水平相对有所减轻。五年间,农业税实际负担率除1954年比1952年有所增加外,其余年份均有所下降。五年平均农业税实际负担率为11.67%,比1952年下降0.53个百分点。

3. 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资。五年间,国家投资于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的资金总额42.99亿元。

五年间每年平均8.598亿元,比1952年的6.46亿元增长33.1%。但是,分年考察则很不平衡,前三年增加的不多,1954和1955年不仅没有增加,还有所减少。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强调了更快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以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才有所增加。1956年和1957年对农业的投资额分别达到12.11亿元和12.71亿元,比前三年的平均额6.056亿元,增长104.6%。与此同时,

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资金也有所增加，五年总计金额 99.58 亿元，平均每年 19.92 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总额的 7.4%。国家银行对农业的贷款增加幅度较大，1957 年底，国家银行对农业的贷款余额 27.7 亿元，相当于 1952 年的 6.6 倍。

4. 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政府在重点治理大江大河的同时，把组织农民开展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作为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农业合作化的开展，促进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各地广泛开展了打井、开渠、挖塘、修筑沿江、沿河、沿海堤坝和修建水库等等。五年内共完成土石方 17.8 亿立方米，增加有效农田灌溉面积 738 万公顷，1957 年底全国灌溉面积达到 2733.9 万公顷，比 1952 年底的 1995.9 万公顷增长 37%。1957 年，全国用于排灌的动力设备增加到 1 亿瓦特，比 1952 年增长了 3.6 倍。全国机电灌溉面积从 1952 年的 31.7 万公顷，上升到 1957 年的 120.2 万公顷，增长 2.9 倍。五年间，结合江河治理，修建了上百座大中型水库及骨干排水河道。在农村普遍兴修小型水库的同时，有些地方还建设了水型水电站。1957 年全国农村小型水电站 544 个，发电能力 2 万千瓦，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4.55 倍和 1.5 倍。在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尤其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省和自治区，通过在黄土丘陵打坝护坡，在高原沟壑修建梯田，在平原地区平整地埂，在山区植树造林，对防止水土流失起了重大的作用。

5. 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增加对农用生产资料的投放数量。1957 年化肥施用量达到 37.3 万吨，比 1952 年的 7.8 万吨增长 3.8 倍；农药 14.9 万吨，比 1952 年

增长 8.9 倍；农用柴油 12.9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1.9 倍。1957 年全国农村用电量达到 1.4 亿千瓦时，比 1952 年的 0.5 亿度增长 1.8 倍；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12.1 亿瓦特，比 1952 年增长 5.7 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 14674 台，联合收割机 1789 台，农用载重汽车 4084 辆，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10.2 倍、5.3 倍和 13.6 倍。渔业机动船只达到 1485 艘，比 1952 年有成倍的增加。

6. 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奖励增产模范。农业部根据各地自然区划，分别制定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不同奖励标准，实行中央、省、县三级奖励制。1955 年 12 月，农业部重新制定了《关于奖励农业增产模范的暂行规定》，突出奖励大面积增产和提高科学技术对增产作用的奖励标准，并强调奖励增产模范同农业合作化运动相结合。五年内，涌现出大批大面积增产的典型，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5 年湖南省出现了三个粮食亩产千斤县、105 个千斤区、6997 个千斤社。广东省潮安县 30 多万亩水稻平均亩产 1002 斤，澄海县 16 万亩双季稻平均亩产 1079 斤。浙江省 52 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 85 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河流域垦区 8 万多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 113 斤。上述丰产典型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1957 年全国共有 64 个县、市粮食生产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划的 1967 年要求亩产 400 斤、500 斤、800 斤的指标。

三，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及其成就

五年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加强了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农业部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从 1952 年的 232 个，增加到 1955 年的 7997 个。还建立了牲畜配种站、兽医防治站、农业拖拉

机站等技术推广和服务机构。上述机构在总结农业劳动模范增产经验，再以这些经验，指导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在农作物品种改良和推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作物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的改良、土壤改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一，农作物品种改良和良种推广。到1956年全国建立良种示范繁殖农场2000余处，拥有耕地13.3万公顷，年繁殖推广优良品种7.5万吨。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建立种子田，1956年，黑龙江、吉林、广东、山东、福建等省已有70%以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种子田，面积达到46万公顷，繁殖自留自用良种10万吨。群众性的选种运动，选出一批优良的农家品种：“一五”时期普遍推广的碧玛一号小麦良种，在陕西关中等地，亩产可增加10-100斤，1953年全国种植面积300多万亩，1956年迅速扩大到5500多万亩。南特号早稻良种在苏北等地，每亩增产80-250斤。胜利油菜良种在四川等地每亩增产50-200斤，1956年以胜利油菜良种为基础，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首先选育出322和325一批中国的甘蓝型早熟油菜新品种，增产效果更为显著。在积极选育、繁殖农家优良品种的同时，引进外来优良品种，经过试验、示范，逐步推广。1953-1956年间，从苏联引进早熟陆地棉良种611波、司3173、克克1543，中熟陆地棉良种108夫、司1470，海岛棉良种2依3、5476依、910依、8763依等20多个品种在新疆试种并择优繁殖推广。1957年从日本引进世界稻（经过鉴定定名为农垦58），推广后种植面积迅速增加，促进了长江流域双季稻的发展，增产作用很大。到1957年，全国良种种植面积达到8133.3万公顷，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52%。粮食优

良品种的播种面积所占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4.7%，提高到 55.2%。其中，小麦良种普及率达到 69%，水稻良种普及率达到 63%。棉花优良品种播种面积所占比重从 1952 年的 50.2%，提高到 93.9%；油料作物和其它作物的良种播种面积也有所增加。

第二，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和牲畜疫病的防治。五年间对历史上危害最大的蝗虫的防治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在 1952 年全国治蝗座谈会提出的由人力为主改为药剂为主的方针下，在全国建立了 23 治站，培训了 5 万多农民侦察员、机械手。1955 蝗虫发生面积 117.3 公顷，用药防治面积 86.5 万公顷，在新疆、河北、天津等地用飞机治蝗 6.7 万公顷，使千年蝗害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对水稻螟虫的防治，从 1954 年开始实行四季治理，在南方主要稻区建立稻螟观察区，在螟虫发生区建立治螟示范区。1957 年又推广农业防治与药物相结合的方法，“栽培避螟”和药物防治并重的办法，当年防治面积达 1200 万公顷，螟害率由过去的 10 - 20% 下降到 5 - 10%。对小麦锈病采取组织育种、栽培和植保多学科联合攻关，培育出抗锈品种，控制了锈病的蔓延和危害。1957 年全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面积 467 万公顷，比 1952 年增长 4 倍。在牲畜疫病防治方面，对耕牛危害最大的牛瘟到 1955 年就已经消灭。到 1957 年已遏止牛炭疽病蔓延，猪瘟和猪丹毒也有了有效的防治方法。

第三，农作物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的改革。五年间，对各种农作物精耕细作的传统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使其同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因地制宜加以推广。各地在改革中主要根据自然条件，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农作物的总量。从 1953 年开始，大力推广了北方秋耕、

南方冬耕，一熟冬麦区伏耕，并加深耕作层（6 - 10 厘米）。在南方稻区耕作栽培制度，进行了单季稻改为双季稻、间作稻改连作稻、籼稻改粳稻的改革。从 1954 年到 1956 年间，基本上把间作稻改成了连作稻，不少地方还将一季稻改成了双季稻。湖南、江西两省，1954 年双季稻播种面积仅占稻谷总播种面积的 22.9%，1956 年增加到 52.3%。福建、广东、广西三省双季稻也由 1954 年的 57.8% 上升到 1956 年的 69.8%。1956 年全国双季稻种植面积发展到 466.7 万公顷。在淮河、秦岭以南和长江以北地区通过推广秋耕、深耕、适时播种、合理密植、保墒防旱、培育壮秧等栽培技术，扩大冬小麦、油菜，增加稻麦、稻油（菜）两熟面积。在华北平原地区发展玉米与小麦、玉米与马铃薯的间作套种，增加玉米播种面积，促进了玉米生产的发展。1956 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扩大到 1766.2 公顷，比 1952 年增长 40.6%，总产量达到 230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36.8%。

第四，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五年间主要进行了新式畜力农具的推广和旧式农具的改良。1953 年推广新式畜力农具双轮双铧犁、圆盘耙、播种机、收割器、脱粒机等 69 万多件。在新式农具的推广中，曾一度出现农具质量差、价格高、技术传授和修理配件跟不上，导致积压浪费。1954 年经国务院批准，进一步降低 13 种主要新式农具价格 15 - 40%；颁布《新式农具统一管理办法》，改进推广工作，加强对农具手的技术培训，加快了推广速度。到 1957 年底，全国共推广新式畜力农具 468 万件，其中双铧犁、新式步犁、水田犁、山地犁 300 多万件。在推广新式农具的同时，农业拖拉机站也有重点地得到发展，现代农业机具逐年增加。

第五，土壤改良和增施肥料。五年间，对盐渍耕地进行普查，先后在山东、吉林、河南、甘肃、山西、河北、新疆、内蒙、青海、辽宁等省区建立了盐渍土改良试验站点 20 处，并结合水利建设，采取生物技术和水利工程相结合的措施，对部分盐渍耕地进行初步的改良。农业部、水利部和中国科学院开展了对红壤土的考察和研究，为大面积开发利用和改良提供了条件。江西、浙江、贵州等省开垦了大片红壤荒地，建立了一批垦殖场。如江西省红壤占耕地的 60%，采取增施有机肥、发展绿肥、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开沟排渍、绿化荒山、水土保持等综合措施改造红壤低产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使该省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海南岛、雷州半岛、西双版纳等地区开发利用红壤，为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做出了贡献。五年间，全国每公顷耕地平均农家肥施肥量由 1952 年的 11250 公斤，提高到 1957 年的 15000 公斤。绿肥面积由 1952 年的 230 万公顷扩大到 1957 年的 341.9 万公顷，五年增长 48.6%。

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五年间，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57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 536.7 亿元（1957 年不变价格），比 1952 年的 417 亿元，增长 24.8%，平均每年递增 4.5%。占农业总产值 80% 以上的农作物业产值从 1952 年的 346.6 亿元，增长到 1957 年的 432.6 亿元，增长 24.8%，平均每年递增 4.5%。1957 年粮食总产量 19505 万吨，比 1952 年的 16392 万吨增长 19%，平均每年递增 3.5%。其中稻谷总产量 8678 万吨，比 1952 年的 6843 万吨增长 26.8%；小麦总产量 2364 万吨，比 1952 年的 1813 万吨增长 30.4%。棉花总产量 164 万吨，比 1952 年的 130.4 万吨

增长 25.8%。油料总产量 419.6 万吨，仅比 1952 年 419 万吨增长 0.1%，未完成原定计划。糖料总产量 1189.3 万吨，比 1952 年的 759 万吨增长 56.6%。茶叶总产量 11.2 万吨，比 1952 年的 8.2 万吨增长 36.6%。烤烟总产量 25.6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5.3%。水果总产量 324.7 万吨，比 1952 年的 244 万吨增长 32.9%。黄红麻总产量 30.1 万吨，比 1952 年下降 1.6%。蚕茧总产量 11.2 万吨，比 1952 年下降 8.9%。

在农作物发展的同时，畜牧业得到全面的生长。畜牧业总产值从 1952 年的 47.9 亿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69 亿元，增长 44%。1957 年猪牛羊肉总产量 398.5 万吨，比 1952 年的 338.5 万吨增长 17.7%。大牲畜年底存栏头数 8382 万头，比 1952 年的 7646 万头增长 9.6%；其中役畜 5368 万头，比 1952 年的 5042 万头增长 6.5%；牛年末存栏头数 6361.2 万头，比 1952 年的 5660 万头增长 13.4%。马年末存栏头数 730.2 万头，比 1952 年的 613 万头增长 19.1%。驴年末存栏头数 1686.4 万头，比 1952 年的 1180.6 万头增长 42.8%。生猪年末存栏数 14590 万头，比 1952 年的 8977 万头增长 62.5%；羊年底存栏只数 9858 万只，比 1952 年的 6178 万只增长 59.6%。

五年间林业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1957 年林业总产值 9.3 亿元，比 1952 年的 2.9 亿元增长 2.2 倍。

1953 - 1957 年间造林总面积达到 21102 万亩。1957 年全国木材产量 2786.9 万立方米，比 1952 年的 1233.2 万立方米增长 125.89%。1957 年主要林产品产量：橡胶 346 吨，生漆 1700 吨，油桐籽 51.8 万吨，油茶籽 49.4 万吨，核桃 10.3 万吨，都比 1952 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渔业，1957 年渔业总产值 2.9 亿元，比 1952 年的

1.3 亿元增长 123%。全国水产品总产量 1957 年达到 312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86.8%，平均每年递增 13.3%。在水产品总产量中，海水产品总产量 193.7 万吨，比 1952 年的 106 万吨，增长 82.7%。其中，海洋捕捞量 181.5 万吨，比 1952 年的 100 万吨增长 82%；海洋养殖产量 12.7 万吨，比 1952 年的 6 万吨增长 1 倍以上。淡水产品总产量 117.9 万吨，比 1952 年的 60.6 万吨增长 94.5%；其中，淡水捕捞量 61.4 万吨，比 1952 年的 47 万吨增长 30.6%；淡水养殖产量 56.5 万吨，比 1952 年的 13.6 万吨增长 3.07 倍。

副业产值 1957 年 22.9 亿元，比 1952 年的 18.3 亿元增长 25.1%。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多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和商品量都有所增加。

1957 年粮食人均 603 斤比 1952 年的 576 斤增长比较，除三种油料下降 2.5%外，粮食、棉花、猪牛羊肉和水产品的占有量分别增长 6.2%、13%、5%和 66.1%。

全国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量中，粮食 4579 万吨，棉花 141.2 万吨，食用植物油 133.8 万吨，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17.8%、29.9%和 36.5%；肥猪收购量 4050 万头，水产品收购量 171.7 万吨，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8.2%和 87%。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建设和对外贸易作出了贡献。农产品中工业原料作物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发展。1957 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 330.1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70.6%；平均每年递增 11.3%。农业生产的发展还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五年间，农民通过缴纳农业税累计向国家提供资金达 150.68 亿元，超过同期国家财政支援农业

资金总额的 51.3%。1957 年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额达到 11.4 亿美元，比 1952 年增长 70.3%，平均每年递增 11.2%。五年内净出口粮食 997 万吨，为国家换回了大量的工业建设设备。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刘胡兰烈士纪念碑落成

1957 年，刘胡兰烈士陵园建成，刘胡兰遗骨单独迁进陵园，冥婚至此结束。

1947 年 2 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的消息，使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上不胫而走。随后，毛泽东又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个光辉的名字，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刘胡兰。

10 岁参加儿童团，不到 14 岁便入党，当上了区的妇女干事。躺在铡刀上时，尚未满 15 周岁。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 年 10 月 8 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 8 岁上村小学，10 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 年 10 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 年 5 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 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 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

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是用先进阶级的思想发动和武装千百万原来是小生产者的农民。刘胡兰作为一个14岁的农村少年便能加入共产党，这首先在于她从儿童团起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看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了根本利益。为了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她能不贪财、不惧死，最后面对敌人的利诱，只回答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在刑场上，她又大呼：“怕死不当共产党。”当时，匪军曾从现场的群众中拉出几个人，要他们去打刘

胡兰，但没有一个人动手，这也恰恰表现出当时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恰恰又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8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全国解放后，刘胡兰的事迹被写成书，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剧，生前所在村曾被改为“刘胡兰村”。1957年刘胡兰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当地兴建了刘胡兰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有一尊汉白玉雕成的、昂首挺胸的刘胡兰全身雕像。

当时生活在农村的刘胡兰从没拍过照片，塑造这个形象，是靠继母胡文秀口述介绍刘胡兰的外形特征，由著名雕塑家王朝闻创作出的原件放大、加工而来。

刘胡兰展示在外面的多是凛然无畏、至刚至强的艺术形象，实际在烈士的花季青春中也曾有过丰富的情感生活。

刘胡兰生前两次订婚，一次恋爱，牺牲后又经历过一场冥婚。1946年初，家长按照当地风俗，将刘胡兰与邻村男青年陈德邻订亲。不过因这两个当事人都主张自由恋爱，于是友好商定各自回家劝说父母解除婚约。

同年6月，刘胡兰被破格吸收入党，不久又有人上门提亲。因男方当时在太谷县当学徒不常回家，刘胡兰以不了解男方真实情况而拒绝。当时的刘胡兰已经青春萌动，追求的是自主的恋爱和婚姻。

同年秋，解放军某团连长王本固作战负伤被送到云周西村休养，刘胡兰因常去为王本固做饭、敷药，接触多了，两人产生了爱情。在那个年代，身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的乡村，这种行为表现出的恰恰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解放。

由于战争环境险恶，加之刘胡兰年纪尚小，她与王本固尚未论及婚嫁。当时王连长只把一条毛毯、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送给刘胡兰家，算是订亲的信物。伤好归队时，他又送给刘胡兰一块小手帕留作纪念。刘胡兰临刑前把这块手帕当成最珍贵的物件交给继母。

刘胡兰牺牲后，由大伯刘广谦操持，曾按当地习俗和一起牺牲的石六儿阴配。1957年，刘胡兰烈士陵园建成，刘胡兰遗骨单独迁进陵园，冥婚至此结束。

无情未必真豪杰。英雄也是血肉之躯，每一个英雄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刘胡兰烈士生前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这使得她的英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

刘胡兰牺牲半年后，1947年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18岁方可转正）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久，解放军攻克文水县城，杀害烈士的阎军连长许得胜、大胡子张全宝等先后被公审处决。

刘胡兰兄妹5人，其中有3人是继母所生。她牺牲时，二妹刘爱兰在场亲眼目睹，1948年底，刘爱兰参军被分配到了战斗剧社，在剧目《刘胡兰》的演出中扮演姐姐。

她的两个弟弟后来参军，分别被当地领导改名为“继英”、“继烈”。由于刘父不擅言词，外出做烈士事迹报告，一般由继母胡文秀担任。

不过，有一段时间，刘胡兰的继母遇到严重的政治麻烦。究竟是谁出卖了刘胡兰，这个疑团长期未能查清，胡文秀曾一度受到怀疑，为此还遭到过批斗。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敦厚老实，对此却无法沉默。他和女儿刘芳兰一同赶到北京，找党和国家领导人明断是非。问题最后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过问，才使胡文秀解了不白之冤。

事实真相直到1963年才查清：叛徒是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石五则，他曾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故怀恨在心。一俟阎军到来，便将刘胡兰等7人全部出卖。石五则于1963年2月14日被政府枪决，受到应有的惩罚。

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这是伟大的转变的一年。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更加有了保证。这一年，就是以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载入我国史册的一年。

关于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国务院决定由我向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报告。我的报告，是依据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来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这个报告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七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56年的自然灾荒，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约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约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业就经历了这样严重灾情的考验。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农民发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现了增产的要求。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约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55年增

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组织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设，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业的发展一度受到影响。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灾最重，产量比1955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户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等项的支出和发放生产救灾贷款的款项共达八亿六千万元，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向灾区调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同时增长，生产资料的需要骤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现了紧张情况。可是，尽管如此，1956年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营业，也都得到了发展。这一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较1955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约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达一百一十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完成了给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员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们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设想，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不采取一视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针，或者私营工商业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绝改造的话，那么，二百多万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营业不仅不能得到发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营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从业人员就会遇到失业和转业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业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业放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之内，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业者就在1956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发展所准备好了的。19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们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

服务的问题。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来说，也无论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供销小组、分散生产联合经营等低级形式到手工业合作社的高级形式、从小规模的手工业合作社到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部分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同时，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联系配合起来进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万万人民生活的历史大变革后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获得很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错误，有的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检查。我们欢迎全国人民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当然，我们在检查偏差和错误的时候，要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要分析在当时那些偏差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

是无法避免的。这样，我们才能判明这些偏差和错误的性质、程度和范围。对于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错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坚决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的人，我们应该公开向他们道歉；在运动中没有处理完毕的问题，现在应该由有关机关迅速予以处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绩的。以思想改造运动来说，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问题的处理是比较粗糙的，因而损伤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再以肃清反革命运动来说，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计有以下四类：（一）因积恶累累民愤极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解放后到1952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经刑满释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现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经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现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宽大处理、教育释放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经过劳动改造或者宽大处理而得到释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们已经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们认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将会得到

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检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认为肃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主席已经提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检查，我们相信，检查的结果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错误来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在个别单位甚至个别地区发生的错误比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和典型试验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说这些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错误、抹煞成绩，引导一些立场不稳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质或者部分性质的偏差和错误，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质或者全面性质的错误，以达到他们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敌我矛盾了。应该指出，目前在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地主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早被消灭,但是这些阶级的分子,还正在劳动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们固有的阶级思想和阶级感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私营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们还拿定息,对工人阶级还有剥削关系,因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说股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这些谬论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剥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打掩护。有少数资本家主张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更是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露骨的表现。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资产阶级还存在着两面性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明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继续改造的必要吗?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他们进行自我批判,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们得到“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要作到这一点,又非经长期的改造功夫不可。这对绝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来说,又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不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吗?由上述情形看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更不必说在人民内部之外,还存在着我们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敌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经明白看到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思想斗争,也有政治斗争。因此,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无视还

有敌我矛盾的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继续进行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已经正确地规划了建设和改造相结合的步骤。而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现在我举出一些数字说明这个情况。

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1956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从主要工业产品看，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金属切削机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调整设备和改变型号的原因，虽然在台数上比1952年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种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6年，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业产品，1956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较多的增加。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轻工业生产由于1955年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增长速度很快。例如，棉

纱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万件，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件；棉布的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万匹，而1956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万匹；食糖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将近十一万吨。

1956年，我国的农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如前所说，总产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超过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亿八千万元的水平。1956年，在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农业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前三年共开垦荒地三千六百万亩，而1956年就开垦荒地二千九百万亩；前三年扩大的灌溉面积共四千一百多万亩，而1956年就扩大了一亿多亩。

1956年全国完成了将近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等于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因而改变了前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只完成五年计划一半稍多的情况，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六，这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能够超额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钢的生产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万吨；新建和修复的铁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产和建设的迅速发展相适应，1956年在运输方面和贸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现代运输工具前三年的货运量共增加了一亿一千二百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万吨；商业机构零售总额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亿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亿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显然，1956年的建设成就是极其巨大的。这就使国家有比较充足的力量来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

营经济，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又保证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从而准备了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利条件。

1956年政府对国家建设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将要在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分别作的关于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详细指出。1956年预算开支中的某些项目和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从财政方面说，执行国家预算的结果，当年支出超过当年收入十八亿三千万元，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十六亿五千万元，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亿八千万元，银行发行货币也多了一些，因而动用了库存物资大约二十亿元。从经济和文教方面说，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同时，职工的人数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职工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虽然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这两种物资的供应都较紧张，并且减少了国家的物资后备力量。在造成物质供应紧张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额大了一些，“摊子”铺得多了一些，这样就多增加了财政的开支，多增加了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也就多增加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耗。

对于1956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我们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许多建设项目在前三年已经完成了土木工程，需要在1956年进行大量的设备安装工程，还有许多项目已经完成了设计和施工准备工作，需要在1956

年开始大量施工，并且还由于设计和施工力量的壮大，设备自给能力的增长，需要在 1956 年安排一些新的项目，这样，就使基本建设的项目大大地增加了。现在从建设项目来看，大多数是安排得恰当的，有小部分动工过早了，或者进度过快了，也有个别项目，是安排得不恰当的。不恰当的项目，显然是错误的。那些动工过早和进度过快的项目，在当年确实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对于长远的建设事业还是需要的。同时，有一些项目，主要是一些非生产性的项目，由于建筑标准过高，造成不少浪费。这些，都应该引为教训，今后力求避免。

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我们在 1956 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经开始察觉，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继续发展。以后在编制 1957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时候，我们就吸取这个教训，缩减了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适当地增加了国家的后备。

这次提交大会审议的 1957 年度的国家预算草案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各种数字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以既积极又充分可靠的步骤向前发展的。1957 年的国家预算收入比 1956 年增长近百分之二；为了避免象去年那样在财政上出现赤字的现象，国家预算支出比 1956 年减少百分之四。1957 年的工业总产值比 1956 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达到六百零三亿元。农业总产值比 1956 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九，达到六百一十一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缩减为一百一十一亿元，它虽然比 1956 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计划原定的 1957 年投资还多十四亿元，五年合计，仍然超过五年计划原定数约五十亿元。在 1957 年已经过去的五个多月时间

内，预算和计划的执行情况，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厉行增产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争取农业丰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那么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完成 1957 年的各项指标，也就能够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议，国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正在由有关部门具体制订中。

应该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所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援助分不开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共有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苏联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的优惠贷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这种真诚的援助，值得我们再一次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还有人企图抹煞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计。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 1956 年全面冒进了，在 1957 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 1956 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1955 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

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1956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1956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1957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或者财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1957年的计划数字同1952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较，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钢的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内，从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计的钢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拿目前我国钢的产量同工业发达的国家的产量来比还是很低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

工业的方针，今后仍然应该继续坚持。我国 1957 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比 1952 年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万元。以粮食和棉花来说，1952 年到 1956 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 1932 年到 1936 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产量合计只六千零五十万担。不要忘记，在 1952 年到 1956 年这个期间，还有两个大的灾荒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开工建设的有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这些建设工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在第一个五年内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建设工程，多数都是旧中国时代所不能想象的。第一个五年期间铁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第一个五年合计为二十八万人，这就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材，而旧中国从 1912 年到 1947 年，三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拿财政的情况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的财政收支各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元，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基本上是靠内部的积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的。五年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经济建设事业和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国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我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无可否认的。那种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们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顾少数人发财享受不顾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很落后，生产消费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须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证明，这个政

策保证了城乡人民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最必需的价格合理的生活消费品，免受私商的剥削，即使在发生灾荒的年份和灾害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这个政策支援了工业建设，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怎么能够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呢？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贪图少数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恋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想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我们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并不是否认在统购统销方面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一度曾经因为供应过宽，不得不增加收购，在某些地区就发生购粮过多、留粮过少的现象。又如，对棉布的统销工作，去年棉布增产较多，供应宽了一些，今年棉布减产，不得不减少供应。这都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顾后和统筹安排不够所产生的缺点。对于各种缺点，政府将继续注意检查和改正。

有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认为我国在建设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看法。我们认为，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习得不好，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先进经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向苏联学习，难道向美国学习建设资本主义的经验么？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才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对别国的经验

要选择恰当并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选择能力和学会正确运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学习得好，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少付代价。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同时，我们又必须批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都当作教条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在目前，正当右派分子用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有更重要的意义。应该肯定，在今后我们还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向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当然，其他国家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知识经验，只要有可能，我们也都要加以学习。

下面我想对于教育改革和向科学进军两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几年来，我们作了这样的改革，并且有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今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还应该继续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过去，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

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这些缺点今后应该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教育改革中有这些缺点，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认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教育改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问题。旧中国的高等学校，由于要适应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需要，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大多数院系庞杂重复，培养目标笼统模糊。各科中工科所占的比重很小，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袭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旧教育的这种情况根本不能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在解放后头几年的国际形势和内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又要求有一部分学校实行内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 and 各个高等学校几年来进行了院系调整 and 教学改革的巨大工作，使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体上能够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需要。但是，教育部门在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是有缺点的，例如，对某些学校安排不当，对老教师的意见和经验重视不够等等。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今后应该力求保持高等学校的稳定，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且要更好地结合我国的实际，稳步地改进现有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

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去

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但是这次整风运动证明，要使教师们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今后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几年来，学校的政治教师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挥更大的力量。

现在我来谈谈学生毕业后参加劳动的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要求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参加劳动者的队伍。解放以来，我国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要适应国家对高级和中级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较多。这样，就造成了近几年来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只有一小部分参加工农业生产的现象。特别是去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多招了一部分学生，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就更加增高了。但是，应该指明，这种现象却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现象，经过国家的妥善安排以后，它将逐渐地转入正常的状态。今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将根据计划少招一些学生，今后我国的各级教育都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因此，今后，一方面每年将会有更多的小学、初中、高中

的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每年又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这才能使我国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加，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扩大。这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现象，也将是今后长时期内存在的现象。

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的，从小学起，特别是从中学到大学和出国留学，劳动人民是很少有份的。新中国的情形就根本不同。我们的教育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近几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他们想把子弟送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因此，尽管我国的各级教育事业几年来的发展在速度上和规模上都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但是，总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我们的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而不可能把好事在一天之内办完。

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高等学校中也应该加强劳动教育，学生毕业后一般地应该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今后应该对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实施。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社会上特别是一部分干部中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因而造成了不少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劳动人民，毕业后不愿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不健康现象。我们应该向所有的青年学生确切地讲明，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有着无限光明的前

途。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工人和农民是最有前途的人。青年学生都应该把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看作最大的光荣，同时又应该认识，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是有困难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不怕艰苦，下定决心吃苦，老老实实地劳动。全国学生的家长们和社会舆论都应该鼓励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农业生产劳动，要继续批判一部分家长和干部轻视体力劳动，阻挠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错误思想和行动。教育部门应该根据上述教育方针，在过去几年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对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彻底地稳步地加以改进。

我还简单地谈谈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七年来我国派遣了七千多人出国留学，派遣的标准一般是按照政治、业务和体格三个条件，这是对的。为了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前，我们对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曾经特别着重政治条件的审查，这是完全必要的。值得引为教训的，是当时在审查政治条件的工作中有形式主义的缺点，因而还有个别政治品质不好的学生也被派出去了。同时，对留学生的业务和体格条件也有注意不够的地方。我们决定今后一般不派高中毕业生，只派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去学习国内所缺的专业。选派留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政治条件的审查，而且要克服上述的各种缺点。有人认为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中，革命干部子女占多了。事实怎样呢？根据已有的统计材料，从1952年到1956年，我们派出留学生六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革命干部的子女还不到百分之三点五。由此可知，那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向科学进军。

以往一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国科学事业有了重要的发展。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试制了1957年的年度计划。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成为常设机构。各方面科学研究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也有了扩大。科学工作体制的原则已经确定。科学工作中的协作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关于图书仪器等科学工作条件的问题，已经或者正在拟定方案，逐步加以解决。有些重要的科学实验设备正在建设中。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功率为七千千瓦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科学研究，一年来也有不少成就。所有这些，都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对科学事业也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

在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却有人说，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甚至有人说，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好象从解放以来，我们在科学方面不仅没有丝毫成绩，而且是倒退了一样。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请看事实：第一，现有科学事业的规模，虽然离我们国家建设的需要还很远，但是，无论在研究人员、机构、经费和设备各方面，都比国民党时代大得多。第二，在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也不是国民党时代所能比拟的。首先是许多老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许多新的学科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发展了一些与工业建设和国防直接有关的学科和

新技术。高等学校也开设了大批新的专业。第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们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力量，还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第四，全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斗争中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社会科学有强烈的阶级性，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科学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中。老科学家们经过思想改造和工作实践，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一般地都提高了。留学生陆续回国，增强了各门学科的力量。大批高等学校学生毕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后备力量。根据以上种种，怎么能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还落后呢？还要补过去十二年的课呢？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科学家在国民党时代非常困苦的条件下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就，而且我们从来就把他们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作为中国科学财富的组成部分。说新中国科学落后于国民党时代的人，无非是否认我们科学家八年来的成就，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罢了。

对于科学规划，有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知识

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集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这个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这个规划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今天的初步蓝图，就不可能有将来日益完备的科学工作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事业，也必须是有计划的。在国家规划之外，无疑也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他们自己所专长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潜力。但是，反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使科学事业陷于无政府状态中，这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本身都是不利的。

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政府今年在医学、农学和机械等方面，已经制定较好的协调方案，并且已经部分地付诸实行。这种作法，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加速了科学工作的开展，以后应该加以推广。有人只赞成本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不赞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他们往往反对协调工作，甚至拒绝国家对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调配，这是一种严重的本位主义作风，应该加以批判。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门户之见而妨碍协作。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

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目前许多领导人都不是科学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人甚至认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教育自己的干部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逐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做好工作。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对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八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是管理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机构，它负责统筹安排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的工作。十二年科学规划，是几百位

中国科学家集体劳动的成果，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也是科学家，这怎么能说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呢？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三、关于人民生活

解放以后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首先，让我们来看占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解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1949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是三百二十六亿元，1956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国家供应给农民的消费资料也随着增长了。1956年比1950年，棉布供应增加了两倍，胶鞋增加了一点九倍，食盐增加了将近一倍，糖增加了二点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样大，是旧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占全国人口第二位的职工的生活状况。1949年末，国家机关、公私企业和事业共有职工大约八百万人，1956年末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人，其中有私营企业转为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村干部共约三百万人。在

七年中间，我们解决了约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52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人对新中国人民生活的这种显著变化熟视无睹，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工人和农民是人民的最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怎么能说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应该承认，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少数职工，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解放以前的几年有了改善，但是还没有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广大工农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多太快。至于占人口极少数的旧社会的剥削者，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解放以前降低了，这是完全应该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少数剥削者过着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处于贫困的半饥饿状态。只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够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首先保证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阶层的合理需要。那些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如果他们不是把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不加分析地当作普遍的整体的现象来下断语，那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只想到极少数的剥削者而没有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

我们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穷，因此，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是很低的。解放以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快的，但是，按全国人口计算的平均产量，却增长得相当慢。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速度，而

其中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农业的增长速度。我们是六万万人口的大国，如果每个人每年增加一元钱的购买力，全国人民的购买力就增加六亿元，国家也就必须相应地增加六亿元消费资料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吃的，就需要增加六十亿斤粮食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穿的，就需要增加两千万匹的棉布供应，也就是要增加两百万担棉花的生产。从1952年到1956年，我国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大约增加三十多亿元。扣除小量的储备和每年人口增长所消费的部分，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左右。这些数字表明每年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消费资料供应紧张、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因此，六万万人民生活的水平只能在本国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不可能要求太快。有些人不从我国上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为一进入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马上就能够有很大的提高，而不懂得必须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建设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道理。过去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向全国人民说明得不够，宣传得不够，这是有缺点的。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天天埋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口口声声称道美国生活方式，他们是在幻想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过那极少数剥削者的生活。

有人说，现在工农的生活太悬殊了。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呢？应该承认，工农的生活是有差别的。但是，当我们把工农的生活加以比较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工农生活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在旧中国的农村，广大的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糠

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目前我国农民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过着略有结余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这一类人还需要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帮助。全国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七十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三百元左右。这里所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不仅包括农民从生产合作社分配到的收入，同时也包括农民个人经营的农业生产的收入。当然，全国各地农民的收入是不平衡的，贫瘠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低，富庶地区每个农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数目高。1956年职工全年的平均工资是六百一十元，比农民一家人的全年平均收入高一倍多。如果只从收入的货币数字比较，似乎工农生活确是很悬殊。但是，如果将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估计在内，情况就不同了。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从全国来看，大约每人每月的平均开支只需要五元，在城市维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却需要十元。因此，我们认为，工农生活水平虽然有差别，但是并不过分悬殊，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因而在工农生活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也是应该的。在过去几次工资改革中，我们对于壮工、杂工、学徒工和一部分临时工的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农民对这部分职工的工资过高表示不满意，也是有理由的，但是，这同那种故意夸大工农生活悬殊，借以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的恶意攻击，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今后对于这部分职工的工资标准，必须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农民生活情况，分别加以规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当地农民的生

活水平大体上保持平衡。我们还应该向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工业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工业的原料和工业产品的市场，职工生活消费资料的供应，很大部分依靠农业的增产和农民的支援。在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不能很快提高的情况下，工人对于生活的改善也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

有人说，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悬殊太大了。如果这个意见是指目前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工农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因而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待遇也不宜差别太大，那么，这个意见是对的。如果这个意见是指不同性质的劳动不应该在待遇上有一个合理的差别，那就不对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所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取消这种差别，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业务、技术水平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悬殊太大，又要反对平均主义。在去年工资改革的时候和工资改革以后，为着适当地缩小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的工资差距，国家对于企业领导人员和国家机关高级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曾经先后采取了控制或者降低的措施。今后对于高级工作人员在工资方面、在住房和医疗等方面以及供给制残余的不合理现象，将继续采取措施，逐步地加以调整 and 解决。至于有人故意夸大高级工作人员和低级工作人员待遇上的悬殊，甚至把领导人员说成是“剥削者”，如果他们不是极端幼稚无知的话，那便是别有用心了。下面我想对于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学徒制度、人民文化生活等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劳动就业问题。

解放以来，经过逐年的努力，如前所说，全国职工增加了一千三百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招聘工作，去年进行了登记，今后将按照他们的学识专长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分年逐步地加以安排。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安定了，社会的医药卫生工作加强了，社会救济和职工福利的事业发展了，因而人口的增殖率有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的工业还很落后，国家机关和工业企业的职工已经增加过多，今后每年只能根据生产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吸收必要的人员。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劳动就业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参加农业劳动。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也将是劳动就业的一个辅助方面。最近上海、江苏、广东等地方劳动部门因地制宜地积极帮助将近一万多失业人员参加了手工业、服务性行业和各种社会辅助劳动，这是一个好经验。今后还应该提倡由社会团体和群众自己想出各种办法，扩大就业范围，协助国家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也应该发挥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力量，提倡社会团体和群众之间的互助，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最近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所介绍的各种群众性的互助互济办法，是有成效的，应该提倡和推广。

关于工资制度问题。

工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它体现着工人阶级内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各类人员之间的关系，也体现着工农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需要合理的安排，而旧的不平衡和

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这就必须不断地加以调整 and 解决。

解放初，我们国家的工资制度是十分混乱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是轻重倒置、高低悬殊、极不合理的，它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也反映了旧中国各派经济集团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同时，许多老干部和工作人员还实行着老解放区的供给制度。工资制度上的这种混乱状态对于统一的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事业是完全不相适应的。经过 1950 年、1952 年、1956 年几次的工资制度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地建立了大体上适合我国情况的工资制度。但是，它还很不完善。在工资等级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学徒制度、津贴制度、奖励制度方面，在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福利费等等职工福利待遇的规定方面，都还有不切合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需要我们继续加以改进。在工资改革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工资工作经验的时候，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够，对待中国原有的工资制度中有用的经验，还缺乏慎重的研究，甚至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关于学徒制度问题。

对于解放前的学徒制度，它的封建性的陋规是应该否定的，但是，关于学徒学习的期限、学习的内容、学徒的待遇以及酬师制度等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却应该慎重地加以研究和吸取。现在所实行的短期技工训练班和短期培训学徒的办法，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并且加以改革。经验证明，短期培训出来的技术工人，大都技术知识很窄，缺乏多方面的独立的作业能力。同时，

由于学徒期间待遇过高，学习期满后升级太快，升级考试制度不合理，因而容易造成青年工人忽视生产实践经验的倾向，甚至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间滋长着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把掌握生产技术知识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尊重老工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刻苦钻研得来的技术经验，不虚心地向老工人请教学习，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新老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师徒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必须耐心地教育青年工人，使他们懂得，多方面的熟练的生产技术绝不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间能够学到的，必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间，经过不断的勤学苦练才能够逐步地掌握。老工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他们的技术经验是丰富的宝贵的，而且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也是丰富的。他们曾经长期在旧社会里过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生活，他们也亲身体会了新社会的平等的幸福的生活，因而他们最懂得应该怎样珍贵和保护革命的胜利成果。青年工人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但是，他们还年青，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还很少，因此，向老工人学习，在生产实践中锻炼，是今后青年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和生产技术知识的主要方法。同样，在农民中，也应该教育青年农民尊重老农，虚心学习老农的生产经验和政治经验。在知识分子中，应该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科学家、老教育家、老工程师、老医生、老作家、老艺术家，虚心地学习他们多少年来经过刻苦钻研所积累的学识和经验。

关于人民的文化生活问题。

我们国家的文化水平是落后的，文盲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解放以后，我们就积极地推行扫盲和

普及教育。在校的小学生已经从 1949 年的二千四百多万人增加到 1956 年的六千三百多万人。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全国扫除文盲二千二百多万人。从 1951 年到 1957 年，国家用于普及教育的经费将近四十九亿元，占全部文教经费的百分之二十四强，占全部普通教育经费的百分之五十四强。这样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学龄儿童按时入学的要求。除了国家办学以外，我们应该积极提倡集体办学，个人办学，充分地发挥社会集团和群众的力量，以补充国家力量的不足。过去在扫盲工作上，有过忽起忽落的毛病，在小学和幼儿教育上，有过部分待遇过高的错误。这些，现在都在改进中。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后我们应该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国家只能集中地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对于大量的各种文化艺术事业，应该提倡文化艺术工作者自力经营。经验证明，过去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的想法和办法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在广大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业余的文艺和体育活动。国家举办、自力经营、群众业余这三个方面的文艺和体育活动队伍，应该通过实践相互学习和提高，以逐步地满足人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改善人民的卫生保健状况和防治疾病方面，我们这几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的医药卫生队伍已经迅速扩大，城乡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几种对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例如鼠疫、霍乱、天花等，已经能够基本上加以控制。但是，卫生部门在领导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方面，还有时紧时松的毛病；在医疗制度

方面，还有许多不合理和不便于群众的地方；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今后应该坚决克服上述这些缺点，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彻底改善卫生医药工作，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劳动者都能够共同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这是多少年来我国劳动人民所向往的伟大理想。但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文化还落后，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我们的经济还不够，要使我们国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的人民能够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场长期的艰巨斗争。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是几年而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地提倡勤俭朴素作风，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我们的老一代人，要教育年青的一代，使他们懂得美好的生活是必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创造的。

四、关于国家基本制度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这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里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就是宪法规定的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我们的国家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国家制度，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后还必须依靠这

种国家制度，才能保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对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任何动摇都是不能容许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国家制度的一切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而不需要任何改进和发展了。恰恰相反，这种改进和发展是经常需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各种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不能不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制度中有所反映。毫无疑问，这些旧生产关系的残余是一定要一天天消亡下去，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定要一天天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运用方法，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同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很短，我们的经验还远远不够，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才能使我们国家基本制度本身更加健全和完善起来。

至于根据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所制定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形式，更是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的。例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解放初期为了工作的便利，建立了大区军政委员会或者行政委员会。到了1954年，为了适应在计划经济下加强统一管理需要，我们撤销了大区军政委员会。近两年来，为了纠正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统得过严的缺点，我们又研究了体制问题，现在政府正准备适当地扩大地方权力，以便在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有这些改变，显然是必需的，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各方面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必须随着客观情况而不断改进，否则，就不能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甚至起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我们各方面的制度的确有许多还是不够完备的，有缺点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订的当时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当情况发生变化之后没有及时地加以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制度在制订的时候，就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不完全符合于客观情况，甚至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制度上的缺点，是由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经验的时候，没有很好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在现行的各种制度中，凡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应该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有益的意见，分别加以修正、补充或者废除。

我在这里要说一说许多人表示关心的法制问题。我国今天的法制，的确还没有完备，但是也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完全无法可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订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如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选举法、婚姻法、兵役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逮捕拘留条例等等。同时政府根据工作需要，还制订了许多单行条例和规章，发布了许多决定和指示，这些在实际上都起了法律的作用。在国家建立之初，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例如民法、刑法，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没有完全确立以前，是难以制订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颁布暂行条例、决定、指示等等来作为共同遵守的工作规范，是必要的，适当的。只有在这些条例、决定、指示行之有效的的基础上，才可以总结经验，制订长期适

用的法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在初期也是不完备的，也是经过很长时期才逐渐制订出来的。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国家在各方面工作的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经验，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在整理过去已有法规的同时，制订社会主义的各种法律，例如刑法已经有了初步草案，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在由有关方面草拟中。

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他们企图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的办法来诋毁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这些破坏性的言论加上各种伪装，企图迷惑那些还看不清楚他们面目的人。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当然不能同善意的批评相提并论。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健全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所欢迎的。而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

我们的国家有民主和专政两方面的职能。有人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专政这方面的任务就已经没有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仍然在伺机而

动。在原来的剥削阶级分子中，也还有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人。此外，在社会上还有一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犯、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尤其不要忘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经常对我们进行武装挑衅，并且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来进行破坏活动和颠覆活动。因此，我们决不能削弱我们国家的专政的职能，我们必须改进专政机构的工作，继续巩固国防，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根据我国的宪法，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种权利日益扩大并且日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才能享受自由，而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的。与此相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保证了广大人民行使宪法上所给予的自由权利，而对于那些少数反革命分子，必须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右派分子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自由权利太少了，好象是对于反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国家都要给予便利和保证，才叫做有了自由。显然，人民是不会同意给予这种自由的。

右派分子还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认为，只有象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才是最民主的。其实，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了所谓普遍、直接的选举，但是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用各种方法特别是金钱和行政手段控制选举，来保障他们的统治地位。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选举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

定比例的代表。目前我国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在县以上实行间接选举。这种选举制度是适合于我国当前情况的较好的民主形式。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在县以上的各级也实行直接选举。在进行选举的时候，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提出联合的候选人名单，事实证明这是适当的。至于候选人的名额问题，过去在联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候选人数和当选名额相等，这是各方面协商的结果。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作法，也仍然要经由各方面协商决定。总之，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是为了真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而不是用虚伪的形式欺骗人民，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选举是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一个方面，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还有更丰富内容。宪法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国家机关就是根据这种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进行工作的。许多重要的法律，在制订过程中，都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国家的经济计划，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控制指标或者草案交给基层生产单位的广大群众讨论，然后加以确定；为了发动广大职工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和对企业行政领导工作进行监督，我们在企业中正在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也根据民主办社的原则，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务委员会。我国公民，经常通过人民代表、监察机关、人民团体、报纸刊物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也常常直接用来信来访的形式向各级领导机关申述意见。我们的国家机关，正是通过这

些办法，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政府领导机关对待人民批评、建议、来访和来信的工作还做得不很好，我们应该迅速加以纠正，并且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十分重视这种工作。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也是我国民主生活的一个显著的表现。发动群众来公开揭发和批评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工作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加以克服，这是任何号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会做，而且也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应该指出，在我们国家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中还存在着，甚至是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习气。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还只是初步建立起来，旧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还经常在侵蚀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干部；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他们行使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还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就有可能滋长起来。同时，我们国家的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点，例如机构庞大，层次过多，有些事权过于集中等等，也助长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习气的存在，妨碍着我们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的联系，给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失。我们必须继续扩大民主，依靠群众的监督，不断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们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把广泛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互相结合起来。我们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我们之所以要有广泛的民主，是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不可能使全国人民在一个共同的方向、统一的计划下进行有组织的共同斗争，也就不可能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是

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动而有所不同的。大家知道，过去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我们对于民主和集中这两方面比较着重于集中，但是，即使在战争和革命的时期，集中仍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民主。近两年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经济管理工作上，民主的扩大都是很明显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因为民主的扩大而根本否定集中的领导。小资产阶级从他们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出发，常常向往于所谓“绝对民主”，也就是不要集中领导的民主。这种“绝对民主”只能使人民陷入散漫的、无组织的状况中，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特别喜欢这种“绝对民主”的观念，企图利用这种观念来涣散劳动人民的意志，瓦解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为了击败右派分子的阴谋，我们必须坚决地保卫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度，不让那些所谓“绝对民主”的观念来侵蚀我们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宪法明文肯定了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就是要领导全中国人民建成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中国人民历来所憧憬的大同世界。难道除了共产党

以外，还有别的党派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这样伟大的理想吗？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新的生活。北京工人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工人阶级的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这是对于这种“党天下”的叫嚣的最好的回答。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也就是把共产党当成一个脱离群众与群众对立的宗派，所以有些右派分子又说，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根子，这是完全违反事实的谰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又主动地提出了愿意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它的最终目的又是要实现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使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趋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党同宗派主义是绝不相容的。共产党总是教育党员要时时刻刻注意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绝不容许党员用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外人士。中国人民大众之所以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因为他们根据事实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工农联盟是基本力量，但是同时必须团结其他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阶层。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具体表现。有了这样的统一战线，就能够更好地联

系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使国家能够及时地采取适当措施来调节他们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通过团结在这样的统一战线之内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共产党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作用和目的就在这里。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然还要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任何怀疑统一战线政策的意义，低估统一战线的作用，轻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但是，必须肯定，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

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和制定的，而在执行这些方针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这种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办法，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正是表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两党或者多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只是资产阶级各派集团欺骗劳

动人民的虚假民主罢了。现在有些右派分子所梦想的，就是要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和“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办法，搬到中国来代替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

1954年我受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组织政府的时候，就是根据宪法规定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提出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的，当时共产党以外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的成员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后来增加政府成员的时候，大致也是根据了这个比例。这种安排是根据当时情况确定的，现在看来也是适当的。

要保证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坚强的核心领导。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相反的，许多专门业务工作应该由专家负责。这里所说的专家，自然也包括共产党员专家在内。至于体现共产党领导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因时因事有所不同，以求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使领导和被领导、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都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更好地合作共事。许多人在这方面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是应该仔细研究的。但是，右派分子提出的“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组织”、“党不要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请共产党下台”等等狂妄要求，却与前面说过的“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各党派轮流执政”等等谬论同出一辙，互相呼应，目的都是要使人民政权脱离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以便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变我们国家的性

质。

有些人批评现在有党政不分现象。对这个问题要加以分析。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有些带有政治号召和政策指示性质的决定或者带有群众运动性质、需要党政一齐动手的工作指示，由同级党政机关联合发布；有些工作的检查，由相应的党政机关联合进行；有些政府机关的会议邀请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对于推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今后还应该继续采用。但是，在某些机关中，共产党的组织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或者对于某些具体业务不通过行政而直接干预，这些现象对于政府工作和对于党的工作都是不适当的，应该加以纠正。

有人提出在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中非共产党员的负责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如果对这个问题加以具体分析，便可以看出存在有各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合作得很好，彼此之间无墙无沟；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对非共产党人士的职权不够尊重，甚至对他们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第三种情况，是有些非共产党人士，对自己的职务尽责不够，并且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采取疏远和猜疑的态度，而有关的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对他们的接近和帮助也往往不够。后两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积极加以克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共产党的组织要教育自己的党员，切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克服宗派主义思想，善于在工作

中尊重、团结和帮助党外人士，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学习他们的专长和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改进工作。对于某些影响团结、增加隔阂的工作制度，应该加以改变。同时，非共产党人士也应该勇于尽职尽责，消除对于工农干部的抵触情绪，消除对于共产党员的猜疑隔阂，开诚相见，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随时提出批评和建议，并且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以期达到双方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目的。在非共产党人士中有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还抱着对立的情绪，他们尤其需要努力改造自己，清除这种对立情绪。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同时也就是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的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于这些错误的思想和作风的任何积极的批评，那怕态度有些偏激，内容不够全面，所根据的个别事实还有出入，我们都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加以考虑，采纳其中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些右派分子硬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在指责我们的国家机关中的毛病和缺点的时候，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相提并论，这些谬论必须加以驳斥。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国家机关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的工具。这种国家机关是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在这种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是不可克服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而且能够吸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来，

是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相容的。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就是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病菌的保证。

五、关于国内外团结

各位代表，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人民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稳步前进；人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步地提高；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国家制度正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着巩固和推动的作用。我们究竟是依靠了什么力量，才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呢？就国内来说，我们是依靠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就国外来说，我们是依靠了我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依靠了我国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比过去更艰巨、更伟大的任务。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批判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继续肃清公开的和暗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在国外，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大团结，孤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和平共处。

谈到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问题，首先应该说明人民的界限。在现阶段，人民是指拥护社会主义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的爱国人士，也就是说按照宪法享有公民权的一切人。同社会主义对抗、同人民对立的敌人是反革

命分子，反动的势力和集团，和目前还在受着管制和劳动改造的分子。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敌我之间的矛盾虽然还存在，但是国内的敌人却大大减少了，这就使得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正是因为这样，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特别指示我们要善于分辨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并且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办法。但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没有互相转化的可能的。目前还在管制中的分子，经过劳动改造重新做人以后，可以取得公民权，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而目前属于人民内部的一些人或者某种集团，如果他们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就有可能从人民方面转化到人民的敌人方面去。

处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人民内部，一部分人对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暂时感到不习惯，另外一部分人甚至会感到严重的抵触。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在思想和立场上常常表现出进步、中间和落后的不同状态，常常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分化。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而不是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工人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这也就包含着改造其他阶级分子的立场和思想，使他们能够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

的错误。右派分子一旦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们本身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翻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巩固团结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不断地通过两方面的斗争来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严肃认真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和作风；另一方面要彻底批判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们国家基本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破坏国内外团结的言论，使得在这些最根本问题上的是非更加明确起来。我们相信，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真正爱国的，是愿意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政府对本身工作的检查，都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到不断的解决，使工作中的错误得到纠正。那些企图利用我们人民内部矛盾和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在我们人民内部挑拨是非、企图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相反地，这个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有了国内的团结，我们就更有力量巩固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巩固我们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

一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经常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但是，不断壮大的和平力量终于推动着国际形势在总的方面朝着有利于全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战争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侵

略集团曾经企图在匈牙利打开缺口，然后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个击破。但是，匈牙利人民击退了帝国主义者的进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了深刻有益的教训。结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不久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捷、波两国总理对我国的访问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员之间一系列的互相访问，都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际团结，是任何挑拨离间所不能破坏的。

一年来，苏联对于重大国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合理建议，例如关于裁军、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停止试验核武器、取消在外国的军事基地和撤走在外国的武装部队、举行大国首脑会议等等建议，也推动了国际局势走向和缓。为了维护中近东的和平，苏联还提出了各大国保证中近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干涉它们内政的建议。苏联的这些建议，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主张。这充分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会侵犯别人，也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侵犯我们，我们坚决主张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英勇的埃及人民击退英法侵略、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新的高涨。这一斗争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一年来，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埃及、叙利亚等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争取独立自由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一些，都

是促使国际形势趋向和缓的重要因素。但是，美国却利用英法被削弱的形势，竭力夺取英法在中近东、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加强对当地人民的奴役和压迫。这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由于这个政策带有更大的欺骗性，由于某些国家的人民还缺乏斗争的经验，美国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在某些国家，例如在约旦，一时得逞，使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遭到暂时的挫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正象任何人民运动一样，是不可能镇压下去的。美国越来越露骨的干涉和越来越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一定会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加觉醒，更加清楚地认识美国殖民主义的真面目。在差不多所有被美国控制的国家里，要求摆脱美国控制、采取和平中立政策、反对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证明了这一点。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一定要胜利的斗争。每一次挫折和每一个困难都会教育各国人民，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能够终于找到把斗争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美国侵略者严密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台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反美运动，而这次反美运动又正是发生在美国在台湾建立了导弹基地以后。现在美国又片面地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准备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美国这样作，一方面是为了继续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镇压南朝鲜人民，加强在南朝鲜的殖民统治。这就说明，美国正在步老殖民主义的后尘，不得不日益依靠刺刀来维持它的新殖民主义。可以肯定，美国的新殖民主

义绝不会比老殖民主义有更好的下场。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召开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的建议，强烈谴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片面行动。

美国夺取它的同盟国家的殖民利益和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引起了这些国家对美国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在美国的主要同盟国家中，争取摆脱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和解、进行互利的来往的趋势正在一天天发展。同时，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展开了规模日益宏大的和平运动，这就充分表示美国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警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团结，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队伍日益扩大，由于美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的增长和美国侵略集团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斗争，我们就有可能推动国际局势继续走向和缓，并且迫使帝国主义战争集团接受和平共处的原则。

各位代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是有利的。我国人民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指示，正在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胜利斗争，达到更巩固的团结。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加强国内外团结，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本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1957年7月1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了报告。

各位代表：

我谨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出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一、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

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是在以下的条件下进行的。1955年下半年开始形成了我国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一高潮大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要求提前完成五年计划。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是近三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中，财力上有了一定的结余，物力上有了一定的储备，技术力量有了一定的成长，基本建设的设计、设备、施工组织都有了较好的准备。1956年度的计划，适应了这种新的形势，从而在财政经济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并且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指标，都是很积极的。应该说，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大革命、大建设的高潮中的愿望的。

全国人民对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都很关心。现在，根据对计划执行结果的检查，我们可以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说：1956

年度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或者超额地完成了。

1956年是我国社会制度大变革的一年。在全国组织起来了75.6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全国组织起来了约10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小组，参加的人数达到500多万人，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99.6%和占职工总数99%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82.2%和占从业人员总数85.1%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由于这一伟大的变革，我国就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样，在我国实行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的推动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全国工业总产值1956年完成了586.6亿元，比上年增长31%，这是近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为291.7亿元，比上年增长41.7%；消费资料的生产为294.9亿元，比上年增长22%。机器制造业的生产为57.6亿元，比上年增长90.2%。手工业的生产为117亿元，比上年增长16%。

按工业总产值计算，已经提前一年并且超额9.5%完成了五年计划（即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下

同)。在五年计划所列的 46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已经有生铁、钢、钢材、烧碱、纯碱、硝酸铵、青霉素、氯霉素、各种磺胺、汽车外胎、蒸汽锅炉、汽轮机、水轮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金属切削机床、双轮带铧犁、谷类播种机、客车、自行车、机制纸、水泥、棉纱、棉布、麻袋等 27 种产品的产量，提前一年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1956 年我国试制成功的新的工业产品，根据九个工业部的统计，即达 1,200 多种，其中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15,000 千瓦的全套水轮发电设备、12,000 千瓦的汽轮机和汽轮发电机、单轴自动车床、耐高温合金钢等，都是运用了世界上新的技术在我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现在，这些产品不仅已经试制成功，并且已经投入生产了。各工业部门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主要工业设备的利用率，都比上年有了显著的提高。1956 年各工业部（不包括森林工业部）所管理的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比上年降低了 10.7%，扣除降低调拨价格的因素，比上年降低了 7.9%（原计划降低 8.4%），没有完成计划。生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约 26%（原计划提高 18.6%）。应该指出，按生产工人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不能反映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全面情况。因为在工业企业中，除了生产工人以外，还有不少的非直接生产的职工。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中的非直接生产的职工过多，一般要占生产工人总数的一半左右，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应该逐步改变。工业劳动生产率怎样计算才更合理，我们也正在研究改进办法。

全国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 1956 年完成了 582.9 亿元，为计划的 96%，比上年增长 4.9%。1956 年我国遭受了最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某些农作物受

到很大的损失，受灾的农田面积约 2.3 亿亩，受灾的人口约 7,000 万人。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在全国农民中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农业增产运动，在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增加农田施肥数量、精耕细作、推广优良品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灾地区的广大农民，同灾荒进行了搏斗，缩小了灾荒所造成的损失，因而使主要农作物如粮食、大豆等的全国总产量，仍然有所增加。1956 年粮食总产量为 3,650 亿斤，比上年增加了 154 亿斤，增长 4.4%；大豆产量为 204.7 亿斤，比上年增加了 22 亿斤，增长 12.2%；棉花产量为 2,890 万担，比上年减少了 147 万担，下降 4.8%；猪的头数年末达到 9,780 万头，比上年增加了 988 万头，增长 11.2%。1956 年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已经接近完成五年计划；粮食的总产量则已经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有很大的增长。1956 年完成了 139.9 亿元，为计划的 99.9%，比上年增加了 53.6 亿元，增长 62%。这是解放以来，投资额增长最多的一年，也是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最多的一年。1956 年和前三年所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累计计算，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 86% 左右。这样，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基本建设计划就有充分的保证了。1956 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 625 项，已经全部投入生产的有 89 项，其中主要的有：煤矿 20 项，电站 21 项，黑色和有色冶金 3 项，建筑材料 4 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 21 项，棉纺织和制糖等轻工业 12 项。1956 年铁路铺轨 3,108 公里，其中：新建 1,747 公里，恢复 285 公里，新建和恢复复线 210 公里，新建企业专用线 866 公里（仅

系铁道部负责修建的，下同)。宝成线和鹰厦线已经全线临时通车。1953至1956年铁路铺轨累计为7,532公里，其中：新建4,387公里，恢复324公里，新建复线356公里，恢复复线420公里，新建企业专用线2,045公里。新建铁路铺轨总数已经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铺轨总数303公里。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部门新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1956年一年中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超过了解放前全部的炼钢能力。旧中国几乎没有的机器制造业，完全没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现在都建设起来了。近代化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建设起来了。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交通运输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1956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完成了24,605万吨，超过计划11.6%，比上年增长27%；货物周转量完成了1,203.5亿吨公里，超过计划11.6%，比上年增长22.6%。都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

在经济事业发展的同时，全国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在1956年也有很大的发展。高等学校招生18.5万人，超过计划5.2%；中等专业学校招生43.3万人，为计划的97.4%；初级和高级中学招生234.3万人，超过计划9.6%；初级和高级小学招生2,345.3万人，比上年增长35.6%。各级学校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比上年有很大的增长，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和小学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提前一年超过了五年计划。

1956年中国科学院所属科学研究机构达到66所，研究人员（包括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达到4,475人。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比以前加强了。各部所属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05所，研

究人员(包括工程师和技术员)达到10,307人。同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科学家们初步制定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草案)。

1956年摄制影片176部,超过计划37.5%。电影放映队达到6,233队,为计划的97%。报纸发行243,942万印张(即对开报纸,下同),超过计划2.2%。杂志出版76,343万印张,为计划的89.3%。图书出版435,613万印张,超过计划16.2%。以上各项,都比上年有很大的增长。此外,图书馆、博物馆也都有所发展;艺术有了进一步的繁荣,民间艺人得到进一步的安排。

1956年卫生部门所属的医院和研究所的病床总数达到214,673张,超过计划2.3%,比上年增加了40,980张。对于危害人民健康的各种慢性病的防治,特别是对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已经开始取得成绩,治疗了患者40万余人。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并且发挥中医的作用,已经吸收了大约3万名中医参加公立卫生机构的工作。此外,在卫生防疫、医疗预防、妇幼卫生等各方面,也都进行了很多的工作。

随着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56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全国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文化、教育、科学、卫生部门的工人职员总数(以下简称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总数)年底达到2,240万人;年平均人数(全年每日实有人数的累计数,除以365日,即得年平均人数,下同)为2,117.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535.7万人,除去由私营工商企业等转变为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干部305万人以外,实际比上年新增加了230多万人。这是几年来就业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如果将包括

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和不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合在一起计算，那么，1956年底就是2,417万人，比计划以内达到的2,240万人多177万人。

1956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约27亿元，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全年职工的工资总额除以年平均人数，即得年平均工资，下同）增长了接近14%。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根据许多地区的调查，凡是没有受灾或者受灾不大的地区，约有80%左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产量，约有75%左右的农户增加了收入。受灾地区虽然减产或者收成很少，但是经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生产自救，加上政府的大力援助，除了个别工作不好的地区以外，受灾地区农民的生活也一般地得到了保障。

1956年社会购买力达到约465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这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物质生活有所改善的具体表现。

总之，我们在1956年的工作是获得了极为巨大的胜利和成就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伟大胜利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毫无疑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获得的伟大的胜利和成就，将给我国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的极为有利的影响；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某些困难。这些困难的发生，有的是由于客观的原因，有的则是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

现在看来，1956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是应该着重指出的：

第一，1956年国家对于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多了约15亿元到20亿元。由于基本建设的投资额过大，因而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基本建设投资额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特别是超过了建筑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生产增长的速度，从而就引起了钢材、木材和若干种机械设备供应的紧张情况。应该说，这是1956年计划工作中的一个错误，但是我们当时并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而是在后来才了解的。由于历年来的基本建设计划总有5%左右不能完成，在编制1956年的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我们也以为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但是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却完成了99.9%，因而就更加显出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是定得过大了。

第二，1956年银行信贷计划，农业贷款增加11.2亿元，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贷款增加2.9亿元。但是执行的结果，对农业的贷款却增加了20.3亿元，对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9.4亿元。两项共计29.7亿元，超过计划15.6亿元。为了从财力上保证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增加这些贷款是完全必要的。这几项贷款的原定计划显然是小了。在执行过程中增加了这些贷款的数额，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撙节地加以使用，也可以少贷几亿元。在执行中有一小部分应该少贷的而没有能够少贷，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第三，1956年计划新增加工人职员84万人，但是执行的结果增加了230万人，超过计划146万人。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许多事业的扩大超过了原定计划，在执行劳动计划的过程中稍稍超过原定计划也是必要的，但是

显然超过得太多了。这是我们控制不严和有些部门轻易招收职工的结果。此外，在1956年增加了职工的工资，这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增加得多了一些。

第四，1956年教育事业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定得过高了，在执行过程中又有某些方面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结果，就使有些学校招生的数量超过了师资、校舍和设备供应的可能条件，给师生在教学方面和生活方面带来了一些困难。

由于以上的缺点和错误，在我国财政收支方面，出现了赤字；在银行信贷收支方面，也出现了差额，多发行了一部分货币；这两者又集中表现为过多地使用了几年来国家所积蓄的商业库存和物资储备。这样，就给1957年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的安排，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晌。

应该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为了顺利地渡过1956年的大灾荒，适当地使用国家的后备力量，是完全应该的，不使用是不正确的。这样做，虽然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能够逐步克服的。我们还应该了解，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通常都是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大波动的。我们为了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曾经忍受了不知多大的牺牲和困难，而今天，我们在取得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的斗争中，并且在同时又取得大建设的胜利和渡过很大的灾荒，只引起这样一点小小的波动和困难，难道能够说我们的情况是不好的吗？应该说总的情况是很好的。由于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我们对于在大革命中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波动，可以自觉地在 1957 年及其以后的计划中加以调节。我们的物价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国家若干后备物资在 1957 年就可以部分地得到补充，人民生活也还可能争取有所改善。这就是说，在 1955 年到 1956 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真是一次和平革命，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革命中可能引起的破坏和损失，这对于全中国的人民是极为有利的。

二、关于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说明

在 1956 年度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编制了 1957 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如前面说过的，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有些已经提前完成，有些接近完成。这些是安排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利条件。但是，1956 年我国遭受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对于 1957 年国民经济的各方面都有不利的影响；由于前面说过的 1956 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使得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这些是安排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困难条件。根据上述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综合平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的方针下，我们编制了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大家知道，年度计划的编制必须做到既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有充分可靠的物力、财力的保证，并且保留必要的后备。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是尽可能地使基本建设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使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劳动工资的安排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相适应；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上下年度之间能够比较平衡地向前发展。在安排消费同积累的关系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消费；在安排生产同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物资的时候，首先保证必要的生产上的需要；在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尽量地注意到各部门投资比例的适当，并且发挥投资的经济效果，力争使用同样数量的钱能够办更多的事。

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已经印成专册，发给各位代表，其中详细数字，我不拟在这里重复了。现在，我仅就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运输事业、商业、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劳动工资等计划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分别加以说明。

（一）工业生产

1957年工业生产的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03.4亿元，比上年增长4.5%（这是按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在1956年为577.2亿元进行比较的）。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1%，为什么1957年计划安排的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上年降低这么多呢？

在这里，除了生产资料中的新式畜力农具、锅驼机、水车等农业机械因为1956年生产过多，1957年计划基本上停止生产，机械制造工业的其他若干产品因为1957年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它们的产值也将相应地有所减少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1957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比1956年增加很少。消费资料生产在我国全部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56年为50.3%，1957年计划为48.4%；而在消费资料生产中，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又最大，1956年为77.7%，

1957年计划为77%。由于棉纱的产量1957年计划比上年减少61.1万件,使棉纺织工业的产值将减少14.4亿元,仅此一项,就使全部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降低约2.5%。1957年计划安排的全部食品工业的产值比1956年增加2.2亿元,增加也很少。1957年的工业生产计划,由于纺织工业的生产下降,食品工业的生产增加很少,这样不仅使整个消费资料的生产计划只比上年增长1.1%,并且把1957年全部工业生产计划的增长速度也拉下来了。

但是,把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生产的计划增长速度分开来看,情况是各不相同的。1957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为311.3亿元,比上年增长8%;消费资料的生产为292.1亿元,比上年增长1.1%。

1957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增长速度如下:

电力:188.6亿度,比上年增长13.7%。

原煤:11,727万吨,比上年增长10.7%。

原油:150万吨,比上年增长29%。

生铁:555.4万吨,比上年增长16.3%。

钢:498.7万吨,比上年增长11.7%。

钢材:447.8万吨,比上年增长17%。

烧碱:17.8万吨,比上年增长13.8%。

硫酸铵:49.9万吨,比上年增长11.8%。

水泥:680.7万吨,比上年增长6.5%。

蒸汽锅炉:4,019.7蒸发量吨,比上年增长33%。

汽轮机:14.35万千瓦,比上年增长19.1%。

发电机:28.4万千瓦,为上年的98.9%。

电动机:125.1万千瓦,比上年增长17.7%。

变压器：359.8 万千伏安，比上年增长 26.4%。

金属切削机床：22,640 台，比上年增长 2.7%。

载重汽车：7,900 辆，比上年增长 324.8%。

原木：2,506 万立方公尺（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 21.9%。

从上列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主要产品的生产增长情况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产品的产量，1957 年比上年增长在 10%以上，一半以上产品的产量，1957 年比上年增长在 15%以上。在 1956 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上年增长 41.7%的基础上，还能够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应该说不慢的。这说明，我们在安排 1957 年度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继续坚持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则，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前面说过，1957 年计划基本上停止新式畜力农具、锅驼机、水车等农业机械的生产，1957 年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比 1956 年有所减少，这就限制了机械制造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1957 年机械制造工业的产值计划安排为 54.9 亿元，相当于上年的 95.6%。而 1956 年机械制造工业的生产则比上年增长 90.2%。这样也就不能不影响到 1957 年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如果把机械制造工业的产值从生产资料生产的总产值中剔除出去加以比较的话，则 1957 年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就不是 8%，而是 11%以上。

1957 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增长速度如下：

棉纱：463.5 万件，为上年的 88.3%。

棉布：50 亿公尺（包括手工业生产量），为上年的 85.3%。

麻袋：7,814万条，为上年的99.3%。

面粉：503万吨（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0.2%。

食糖：87.4万吨（包括手工业生产量），比上年增长8.3%。

1957年计划安排的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有些产品比上年增加很少，有些产品还比上年减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由于去年农业遭受灾害，主要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生产，没有完成计划。1956年由于上年棉花丰收，同时进口的棉花也比较多，因此棉纱的生产比上年增长32.2%，但是，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难以为继的。因为我国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的。接连几年的丰收是少有的，在丰年之后，往往是平年或者是歉年。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农业有三年是丰年（1950、1952、1955），有两年是平年（1951、1953），有三年是歉年（1949、1954、1956）。在过去几年中，农业的丰收或者歉收，曾经多次地影响我国轻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起伏。农业的丰歉，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波动，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是难于避免的；但是剧烈的波动，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此，对于粮食、棉花和其他一部分工业原料作物，在可能的条件下，要有必要数量的储备，以调剂歉年之后的生产和消费，减轻社会经济生活的波动。今后我们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应该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的供应比较紧张。我们在分配原材料的时候，对手工业生产需要已经给予适当的照顾。例如：1957年棉布总的生产水平比上年下降15%左右，但是对于手工织布业的生产

产，则计划维持上年生产水平的 90%左右；在钢铁材料的供应方面，除了手工业自己生产的土铁归他自己使用，各地回收的废钢铁首先满足手工业生产需要以外，国家还从统一分配的钢铁材料中给手工业调剂了一部分。采取这些措施以后，1957 年手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估计可以维持 1956 年的水平或者略高一些。

为了保证手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手工业管理部门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该继续调整生产组织，大力整顿社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目前存在着盲目地追求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倾向，变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国营工厂的倾向，应该加以纠正。同时，还应该扶助个体手工业者，不得加以排斥。

（二）农业生产

1957 年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 61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

粮食(不包括大豆)总产量计划安排为 3,820 亿斤，比上年增加 170 亿斤，增长 4.7%。

棉花总产量计划安排为 3,000 万担，比上年增加 110 万担，增长 3.8%。

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生活的要求，落后于轻工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逐步地解决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合作社同合作社之间、以及合作社内部的矛盾，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增产。国家对于农业的发展，一向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为了保证继续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今后还将特别注意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以增加肥料的供应量。开垦荒地需要投资较多，但是为

了增加农业生产，根据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增加一些投资，扩大耕地面积，也是必要的。

前面说过，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的增产，对于工业生产的增长影响很大。目前，我国轻工业有较大的生产能力，棉纱锭子已有 700 多万枚，每年可纺纱 560 万件以上，其他某些轻工业企业也有多余的生产能力。人们会问，为什么不可以多生产一些工业原料作物以充分发挥轻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人口增加很快，耕地面积增加有限，粮食的增加还满足不了人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在现有的耕地中不能更多地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几年来，由于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虽然也有所增加，但是，它的种植面积在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逐年有所下降。1957 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计划安排为 239,989 万亩，比 1953 年增长 11.1%，其中，工业原料作物为 23,071 万亩，比 1953 年增长 31.9%；粮食作物为 184,972 万亩，比 1953 年增长 7.9%。粮食作物在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1953 年为 79.3%，1957 年下降为 77.1%。为了保证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必须适当安排粮食作物同工业原料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在我国还不能大量开荒和大量扩大耕地面积以前，从现有的耕地中不适当地扩大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是不对的，但是，缩小现有的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是不利的。棉花、糖料、油料等主要工业原料作物，应该保持 1957 年的种植面积，不再减少，还应该有小量的增加，并且必须进一步加强精耕细作和采用优良品种等有效的措施，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猪的增产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城乡肉食的供应，而且养猪积肥也是当前农业肥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缓和城乡肉食供应的紧张情况，并且适应农业增产对于肥料的需要，必须提高猪的生产数量和质量。1957年猪的头数，年末计划达到1.1亿头，比上年增加1,220万头。完成这个计划，有没有保证呢？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展养猪业十分重视，生猪的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了14.26%，农民养猪比较有利了；饲料的来源增多，国家给农民预留的精饲料也比上年增加了；再加上适当地增加农民的自留地，以利于农民自己解决蔬菜和牲畜饲料。这些都是完成计划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1957年计划安排的猪的头数，比产量最高的1954年还要超过1,000万头，现在不少地方猪的质量还不高，因此，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计划，并且提高猪的质量。但是，由于采取了上面的措施，目前商业部门收购的猪，数量已经开始增多，部分猪的质量也比上年肥大，可见农民对于养猪的积极性，已经有所提高，完成计划是有可能的。

造林面积1957年计划安排为4,500万亩，比上年减少500万亩。为什么1957年计划造林面积比上年减少了呢？这是由于1953至1956年平均每年造林2,744.5万亩。面积不少，但是成活率比较低，根据典型调查，过去造林的成活率一般在60%左右。因此，必须在保证成活率确实能有显著提高的前提之下，努力完成今年的造林任务。在木材采伐方面，地方林区，过去一般在路远山深的地方采伐得少，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采伐得多，这对于水土保持和林区迹地更新都有不利的影响。今年增加了地方木材采伐的投资，主要用在修路方面，

以便增加深山的采伐量，逐步改变某些不利于水土保持和林区迹地更新的采伐情况。（三）基本建设

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111亿元，为上年的79.4%。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确定，在材料供应方面和财政方面，都进行过反复的平衡计算。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研究，我们采取了111亿元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既能够使1957年的基本建设保持适当的规模，保证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又有利于1958年计划的安排；既能够使1956年造成的某些原材料和某些机械设备的供应紧张情况缓和下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又可以尽量地减少建筑力量的窝工损失和设备的积压。111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同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相比，是显得少了。但是，同五年计划原来所规定的1957年投资额相比，还超过了14亿元；如果把前四年实现了的投资额和1957年计划安排的投资额合起来计算，则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投资总额的49.78亿元。

根据上述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在项目的安排方面，适当地调整了若干部门的投资比重，加强了薄弱环节。主要是：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减少了纺织工业、食品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设备能力暂时还有多余的部门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煤炭、电力、冶金、化学、森林等生产能力不足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保持了农林水利部门的投资比重。增加了地方投资的比重，相应地减少了中央部门的投资比重。例如：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56年的22.4%，下降为1957年的20%左右。又如煤炭、电力、冶金、化学、森林等五个工业部1956

年的投资额共为 34.5 亿元，占工业各部投资额的 50%；1957 年投资额计划共为 37.1 亿元，占工业各部投资额计划的 59.1%。又如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同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工业的投资比例，由五年计划中的 1957 年的 1.9 比 1，改变为 1957 年计划的 3.3 比 1。地方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五年计划中的 1957 年的 13.7%，提高到 1957 年计划的 18.8%。

在编制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到：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我国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工业部门发展的要求；冶金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工业发展的要求。在积极发展我国的原材料、燃料、电力工业方面，除了应该继续建设若干起骨干作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多发展一些投资少、收效快的中、小型企业，和有计划地发展小煤矿、小铁矿、小的有色金属矿和非金属矿，以增加原材料和燃料的产量。在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工业方面，除了发展一些重型的和精密的机械工业企业以外，应该在平时和战时相结合、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制造和修理相结合的前提之下，对各机械工业部所管理的企业、非机械工业部门和地方所管理的机械工业企业，统筹安排，以充分发挥我国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工业的潜在力量。这些工作，我们在 1957 年度计划的安排中，已经开始予以注意，今后还必须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

按照上述投资安排，1957 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 591 项，其中计划竣工的 219 项。各工业部 1957 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 486 项，其中计划竣工的 177 项。在计划竣工

的项目中，主要的有：煤矿 58 项，电站 21 项，黑色和有色冶金 14 项，建筑材料和木材加工 9 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 32 项，纺织、造纸、食品等轻工业 20 项。这些企业投入生产达到设计能力以后，每年的生产量是：原煤 1,080 万吨，发电量 33.6 亿度（发电设备容量 67.3 万千瓦），原油 32.5 万吨，生铁 81 万吨，钢材 48.9 万吨，焦炭 157 万吨，硫酸 4 万吨，硝酸铵 9 万吨，水泥 108 万吨，运出木材 315 万立方公尺，棉纱 69.3 万件（纱锭 71.5 万枚），棉布 64,602 万公尺（织布机 21,325 台），机制纸 13.6 万吨，机制糖 8.7 万吨，等等。但是，实践证明，新建企业在投入生产以后，经过一定时间，它的年产量，很多是会超过设计能力的。

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1957 年农林水利各部和地方农业投资计划共为 9.7 亿元，比上年减少 1.9 亿元。主要是减少了中等技术学校、试验研究机构等建设单位的投资，和减少了拖拉机的增加数量。水利部 1957 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 26 项，其中有水库工程 10 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今年正式开工。地方兴修的限额以上的水利工程 32 项。农垦部兴建的限额以上的农牧场 3 项；地方兴建的限额以上的农场 93 项。1957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都有减少，但是为了照顾农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分配投资额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使农业方面少减一点，工业方面多减一点。

1957 年铁路计划铺轨 1,860 公里，其中：新建 535 公里，恢复 152 公里，新建复线 533 公里，专用线 640 公里。在新建铁路铺轨中：包（头）兰（州）线铺轨 329 公里，福建的南（平）g u n（头）线铺轨 63 公里，

内蒙古的牙克石森林线铺轨 45 公里。交通部 1957 年计划施工的公路有 7 条，其中主要的是新建新藏公路和改建青藏公路；计划新增加的公路里程为 1,125 公里。邮电部 1957 年除了重点建设部分市内电话和增加必需的邮运设备以外，计划架设京汉、京沪、京沈、京西（安）西（安）兰（州）等长途电讯干线的十二路载波电话和改善省内线路。

商业各部 1957 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 17 项，其中主要是肉类联合加工厂和冷藏库，计划新增加日宰猪 1.1 万头的生产能力和冷藏库容量 5.15 万吨。

文教各部 1957 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计 37 项，其中主要的有：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直接管理的）11 项，电影制片厂和洗印厂 7 项，医院 4 项；计划新建、扩建高等学校可以容纳新生 3.3 万人，新建医院增加床位 1,420 张。

在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中，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修改了某些过高的和不适当的设计标准，尽可能地照顾了各个部门之间、各个工厂之间的专业分工和协作配合，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削减了非急需的项目和缩小了某些企业的规模，并且尽可能地就地取材，降低建筑造价。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就节约了资金，提高了投资的经济效果。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需要对原定的设计和规划作必要的修改，这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做得好就可以大量节约，做得不好还可能造成新的浪费。因此，必须节约一切可能节省的投资，同时反对偷工减料，用各种办法提高工程质量。不久以前召开了全国设计工

作会议，已经开始对原定的各项设计和规划进行全面的审查修改工作。我们相信，在全国职工、全国勘察设计和建筑安装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努力之下，一定会把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地坚持下去，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资金，把建设事业办得更好。

（四）运输事业

1957年的运输计划，是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的规模来安排的。

在铁路运输方面，货运量计划安排为25,600万吨，比上年增长4%；货物周转量计划安排为1,26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5.1%。

1953至1956年新建的铁路，沟通了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中原地区和沿海地区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随着生产和建设的发展，随着新线的通车和运量的增加，旧线的负担也大大地加重了，以致有些区段如京汉、石太、同蒲、陇海西段等线路的通过能力，在1956年就感到严重不足，曾经发生了堵塞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现象，1957年适当地增加了加强旧线的投资，加强旧线的投资额在铁道部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56年的26.4%，提高到1957年的39.4%，计划在京汉、石太、陇海等线的某些区段修建复线533公里。经过采取了这些措施和加强运输的组织工作以后，预计铁路运输的通过能力将有所增加。

在水路运输方面，长江的运输能力，过去四年增加了船舶230,620载重吨，1957年计划增加32,600载重吨，五年合计超过原计划2,520载重吨。这对保证四川省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运和各地工业品运进西南

各省，有很大的作用，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已经由水路运出了40余亿斤粮食，支援了受灾地区和缺粮地区。但是，长江的运输特别是川江的运输情况还是很紧张的。这是由于港口的建设落后于船舶运输能力的增加；中、下游的运输能力的增加，没有同上游运输能力的增加相适应。为此，1957年计划加强重庆、汉口等港口的建设，并且建造拖轮以增加长江中、下游的运力。在运输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开始注意加强港口管理，注意港口、航行和修船工作之间的协作配合。

西南各省是我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地区，它有许多农副业产品可以用来支援全国，同时全国各地也必须用许多工业品支援西南。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运输能力不够，虽然增加了长江的船舶，新建了宝成铁路，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除了继续加强水路运输以外，还必须着手进行新的铁路干线建设的准备工作。

由于多国目前石油生产落后，液体燃料供应不足，因此，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发展汽车运输。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发挥铁路和水路现代运输工具的运输能力的同时，应该注意发挥各种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组织利用各种民间运输工具，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后还应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保证1957年运输计划的完成，一切运输部门都必须加强运输的组织领导工作，提高运输设备的利用效率。在各运输部门之间，应该推行联运制度，签订运输协作合同，做好运输的协作配合工作。各产、销部门和运输部门应该大力贯彻执行合理运输和统一送货制度，

并且注意平衡运输。

（五）商业

1957年社会购买力估算约为473.2亿元，比上年增长8.2亿元，增长1.8%。这个社会购买力的计划，一方面是估算了农民在农业生产正常的情况下可能增加的购买力，估算了职工工资总额的增加部分，两项合计，居民的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增长约18亿元；另一方面，由于压缩了机关、部队、企业、人民团体等社会集团的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减少9.8亿元。这样，增减相抵，1957年社会购买力计划比上年增长8.2亿元。

在商品供应方面，1957年社会商品供应总额估算约为463.5亿元。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虽然有一些差额，但是经过认真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尽量开辟原材料的来源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商品的进口，并且加强商品供应工作，加上今年春季对于若干种商品价格的调整，这样就可以使社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接近平衡，市场物价就可以继续保持稳定。

在1956年农业遭受严重灾害之后，国家从丰收的西南地区调运出来50.8亿斤粮食，支援受灾地区和缺粮地区，仅仅河北一省就调入36.3亿斤，使广大受灾地区的农民免于饥饿，使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得到保证，同时避免了粮食价格的上涨。由于棉花遭灾减产，1957年棉纱产量计划比上年减少约61.1万件，以致棉布的销售量将比上年减少2,300万匹左右，不得不把1957年5月份至8月份通用的第二期布票一律对折使用。这样，虽然减少了棉布的供应量，但是也避免了棉布价格的上涨。国家在大力稳定粮食、棉布等主要商品价格的同时，主动地提高了若干种商品的价格，作为平衡社会购买力的

方法，从全局来看，我们认为这种措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这里，简单地谈一下 1957 年对外贸易计划的安排情况。

1957 年计划安排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相当于 1956 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91.6%。在出口计划方面，主要是减少了粮食、食油、猪肉的出口数量，以照顾国内的需要。例如，1957 年计划出口粮食（包括大豆）38 亿斤，比上年减少 10.8 亿斤；计划出口猪肉（包括活猪）7.7 万吨，比上年减少 8.5 万吨。在进口计划方面，主要是减少了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的进口数量，以促进我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

我国的对外贸易，过去几年，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约占 75%左右，矿产品各机械等约占 25%左右。在进口总额中，机器和各种设备约占 60%左右，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约占 10%左右，其他工农业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约占 30%左右。这种出口和进口中各类产品所占的比重，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将逐渐发生变化。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下降；矿产品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上升。在进口总额中，机器设备的进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下降；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某些原材料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某些消费资料的进口额所占的比重，将逐年上升。这种变化，在 1957 年对外贸易计划的安排中，已经有所表现。当然，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这种变化也只能是逐渐的。

（六）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

在教育事业方面,由于1956年学校招生有一部分过多,以致师资和校舍建筑、教学设备都赶不上发展的需要。1957年根据师资和财力、物力方面的可能条件,适当地缩减了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人数,使学校能够有较多的精力,进行整顿,提高教学质量。

1957年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数和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以下简称在校数),安排情况如下:

初级和高级小学招生1,616.9万人,在校数达到6,581.4万人,比上年增长3.7%。

初级和高级中学招生184.3万人,在校数达到556.6万人,比上年增长7.8%。

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级师范学校)招生15.8万人,在校数达到77.5万人,相当于上年的水平。

高等学校招生10.7万人,在校数达到44.3万人,比上年增长10%。

1957年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数,虽然比上年减少了,但是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都还有不少的增加。在解决由于上年招生过多所发生的问题和今年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以后的问题上,还有很多的困难,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应该努力克服这些困难。社会各方面的人士,也应该帮助教育部门克服困难。

应该指出,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我国普通教育的目的,主要的是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者,其次才是为培养专门人材打好普通知识的基础。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强调并且逐步实施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制度。一方面,应该鼓励脑力劳动者参加

一部分可能参加的体力劳动；同时，还应该动员现在机关中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离开机关工作岗位，到农村中、工厂中种几年地、做几年工，以学习和掌握生产知识，并且熟习工、农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和思想。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逐步地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同时，还应该经常从工、农劳动人民中，有计划地挑选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并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人，到机关中工作，以便加强机关工作人员同工、农劳动人民的经常联系。现在还有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这在目前还不可避免。不能入学的学龄儿童，只好晚一些入学。小学、中学毕业生的大部分不能逐级升学，应该参加体力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现象。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已经到达劳动年龄的，凡是家在农村的，应该说服和支持他们回农村参加生产；家在城市的，如果在城市安排不了，也应该尽可能地动员和安排他们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这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必须采取的方针。

在我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情况下，除了合理地使用国家办学的力量以外，群众办学的方法应该积极提倡。机关、团体和企业的职工，可以自己出钱集体办学（不由机关、企业拨款）；农民和城市居民也可以组织起来，集体办学；知识分子可以合作办学；热心教育事业而又有条件个人办学的人，也可以个人办学。总之，小学和中学教育，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进行。国家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将逐年增加，计划所安排的中、小学招生数，也将逐年有所增长。但是，国家的物力、财力有限，因此，教育经费和招生人数每年不能增加很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在不增加

国家拨款的限度内，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集体地或者个体地来办小学、中学或者其他的学校，是能够多招收一些学生进行学习的。

今年中等专业学校，除了中级师范学校将继续在初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以外，中等技术学校计划从现有企业的职工中招收新生。

高等学校今年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还是不小的。我们要求巩固已有的成绩，克服缺点，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在卫生事业方面，继续贯彻执行预防为主方针，继续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仍然是1957年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乡村医疗工作，应该进一步发挥基层卫生组织的作用，更多地组织门诊、出诊和巡回医疗；城市应该注意发挥联合诊所的作用和适当地增设联合诊所，合理地改进公费医疗制度，以便腾出更多的医疗力量，来照顾城市一般居民的治病要求。不论乡村或者城市，都应该进一步地发挥中医的作用。

在科学研究事业方面，1957年全国科学研究计划草案，已经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国第一个研究原子核的功率为7,000千瓦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2,500万电子伏的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1957年中国科学院将着手建设几个重要学科的研究所，如电子学、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核子物理、力学等研究单位，为今后新技术的发展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各部和各地方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统筹安排，分工协作，以合理地使用科学研究的人员和设备，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在文化、出版事业方面，应该给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限，1957年文化事业的各项计划指标，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根据分配的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

在体育事业方面，应该继续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七）劳动工资

1957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总数，年底计划达到2,226.2万人，比上年减少约14万人。1957年的年平均人数，计划安排为2,216.8万人，比上年增长4.7%。

为什么1957年年底计划达到的职工总数要比1956年年底的实有人数减少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年度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缺点，即建筑安装部门的许多单位第四季度赶工，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许多单位第四季度赶任务，大量增加职工，而到下一年的第一季度就要窝工。我们初步接受了这些经验教训，1957年要尽可能地克服这一缺点适当地减少职工人数。这一缺点的造成，是同劳动计划控制不严，年度计划下达时间过晚，财政上的年终结算制度执行有缺点等等分不开的，因此，今后应该合理地安排计划，提前下达任务，纠正执行财政上的年终结算制度的缺点，以便使各经济单位有可能均衡地进行生产和均衡地完成计划。同时，一切企业和事业单位，除了经上级批准的，需要赶工或者赶任务的个别特殊的工程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以外，都不得在第四季度赶工或者赶任务。过去不少单位用增加人员、加班加点以及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来超额完成任务，甚至以此贪图奖金，这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同时使工程质量、产品质量和工作质量下降，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应该坚决纠正。1956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00多万职工，其中一半以上是临时工和季节工。根据不完整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有不少万人回乡进行农业生产去了。这就证明，1957年年底达到的职工总数，比上年减少约14万人，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我国人口多，劳动资源丰富。目前我国厂矿企业的职工已有多余，而工业又只能逐步地发展，不可能每年都大量招收职工。因此，今后劳动就业不能只在工业方面打主意，而要更多地在农业、农副业和手工业方面打主意。

1957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工资总额，计划安排为141.2亿元，比上年增加12.1亿元，增长9.4%。其中：(1)1956年增加的工资是从四月一日或者七月一日起发给的，只发了两个或者三个季度，1957年要发四个季度，再加上某些正常的升级，这一项比上年增加约5.7亿元；(2)1956年各个月份陆续增加的职工，1957年都要支领全年的工资，连同1957年人数增减相抵以后，这一项比上年增加约6.4亿元。

以上所说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就是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各位代表！1957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完成以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现在，对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可能完成情况作一些预计，我想是有必要的，也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

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03.4亿元，超过五年计划12.7%。这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的递增率将是17.4%，比

原定的 14.7% 的增长速度加快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重，将由 1952 年的 39.7 比 60.3，变为 1957 年的 51.6 比 48.4。我国钢的生产量，将由 1952 年的 134.9 万吨，提高到 1957 年的 498.7 万吨，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 5.4 倍。由于我国新的工业企业不断地投入生产和技术力量的不断地成长，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业生产部门和新的工业产品。在 1953 至 1956 年，我国已经试制成功并且开始成批生产的最重要的新产品有：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6,000 千瓦和 12,000 千瓦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10,000 千瓦和 15,000 千瓦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31,500 千伏安的变压器、日产 160 吨钢的平炉、滚筒直径 4 公尺的电动卷扬机、多种型式的自动车床和机床、矽钢片、优质薄板、无缝钢管、50 公斤的重轨、大型工槽钢、铝材、高纯度的苯胺和磷甲苯胺等等。1957 年我国计划继续试制和开始试制的主要新产品有：72,500 千瓦的全套水力发电设备、25,000 千瓦的全套火力发电设备、40,500 千伏安的变压器、2,500 吨的水压机、700 公厘的全套轧钢机、80 吨（车身重）的电机车、载货量 5,000 吨的沿海货轮、载油量 4,500 吨的沿海油轮、40 马力的拖拉机、四轴自动车床、组合机床和铟、硒、碲、锗、镓、钴稀有金属产品等等。

1957 年的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 611.5 亿元，超过五年计划 2.5%。这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和农副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的递增率将是 4.8%，比原定的 4.3% 也将超过。我国粮食的产量，将由 1952 年的 3,088 亿斤，提高到 1957 年的 3,820 亿斤，而在 1949 年只有 2,162 亿斤。我国棉花的产量，将由 1952 年的 2,607 万担，提高到 1957 年的 3,000

万担，而在 1949 年只有 888 万担。

1957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 111 亿元，超过五年计划的 1957 年投资额 14%，加上前四年已经实现了的投资额，预计可以达到 477.22 亿元，比原定的五年投资总额超过 11.6%。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将达到 825 项，比原定的 694 项超过 131 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竣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将达到 448 项，比原定的 455 项减少 7 项，主要是因为有些建设单位的规模扩大了，有些建设单位的进度延迟了。各工业部五年预计竣工的限额以上的厂矿企业建设单位共计 350 项，其中主要的有：煤矿 94 项，电站 37 项，炼油厂和油矿 7 项，黑色和有色冶金 20 项，化学工业 10 项，建筑材料和木材加工 13 项，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 108 项，纺织、造纸、食品等轻工业 45 项。五年预计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按每年的生产量计算，主要的有：原煤 4,528 万吨，发电量 104.7 亿度（发电设备容量 209.4 万千瓦），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 126.5 万吨，生铁 309.4 万吨，钢 217 万吨，钢材 114.9 万吨，水泥 239.3 万吨，棉纱 161 万件（纱锭 166 万枚），棉布 14.1 亿公尺（织布机 46,552 台），机制纸 21.5 万吨，机制糖 15.5 万吨。这些都是按设计能力计算的，前面说过，很多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是会超过设计能力的。

1957 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的年平均人数，计划安排为 2,216.8 万人，社会就业面比五年计划扩大了。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计划比 1952 年增长约 37% 左右，超过原定增长 33% 的水平。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也有相当的增加。高等学校、中等专

业学校、高级和初级中学、高级和初级小学，计划安排的学年初在校学生人数，比五年计划超过 2%到 18%。

因此，实现了 1957 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除了个别的建设项目、个别的产品和某些事业的发展指标以外，绝大多数的建设项目、绝大多数的产品和绝大多数的事业的发展指标，都可以超额地完成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将要建立起来了。我国基本上已经能够用自己制造的设备，建设自己的电站、采矿企业、中型冶金企业、金属加工企业、化学工业企业和轻工业企业了。我国已经开始用自己制造的机械，装备自己的运输部门、农业部门和加强国防了。我国也已经能够用自己生产的金属材料，来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建设事业的大部分需要了。我国人民知道，这些成就，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我国的援助分不开的，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援助再一次表示深切的感谢。

三、为实现 1957 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为了保证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满实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它不仅是保证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实现的根本措施，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战略意义的方针。

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

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已经发出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也向全国发出了号召，不再重复。这里我只想着重地说一说在基本建设的各个方面，如何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的问题。因为基本建设的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在建设事业中如果能够从各方面很好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就可以保证我国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过去几年我国的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新的工业企业建设起来了，许多新的工业城市出现了，许多原有的城市的工业大大地发展了，许多消费城市开始改变为生产城市。但是，应该指出，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的经验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领导部门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国的建设事业，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使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例如，在工业建设方面，对于新建和改建企业项目的安排注意较多，而对于合理地利用我国原有的中、小型企业和手工业注意不够。在工业的技术政策方面，某些地方不适当地强调了大规模、现代化和高标准，而对于建设中、小型的企业，很好地利用我国劳动力多的优点，则注意不够。在工业建设的设备供应方面，有些可以用自己能够制造的设备而不愿意用，要求从国外进口同类的设备。在工业建设的相互配合方面，不注意组织生产的协作，而要建设全能的工厂。建筑的安全、卫生、防空、防火、防洪标准偏高，城市规划过大，办公楼、招待所、休养所、大礼堂等盖得过多，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追求豪华、铺张浪费的不良现象。所有这些缺点，都给

我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一些损失。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这些缺点，使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更加适应于我国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农业比重大和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现实情况。为此目的，我们准备有步骤地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第一，新工业企业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现有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及其相互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以便迅速地增加生产，相互促进其发展；而避免相互排挤，阻碍生产的发展。

第二，在工业建设中，应该采用适合于我国经济条件和工业水平的技术装备。为着我国的工业化，必须建设一批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企业作为骨干。但是，其他企业的建设，应该提倡最新技术同一般技术相结合，机械化、半机械化同手工操作相结合。

第三，大型企业的建设，要同中、小型企业的建设相结合，并且今后应该多建中、小型企业。

第四，除了某些我们自己还不能设计的、技术水平最先进的企业的建设，必须请苏联和有关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之外，一般中、小型企业和中等技术水平的企业的建设，应该努力自行设计和自行制造设备。只要是自己能够制造的设备，即使质量差一点，也应该采用。

第五，以市或者一个地区为单位，尽可能地统一安排企业的协作，临近的工厂，力求共同使用辅助车间、附属车间和实验室。

第六，降低建筑标准。生产性建筑的标准，包括厂房在内，应该在能够保证建筑的质量、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原则下，力求节约，而不应该追求过高标准。宿舍

的建筑标准，不论城市或者乡村，一般应该同当地居民的住宅水平看齐或者稍高一些。现在采用的防空、防火、防洪、卫生等标准，应该适当降低。

第七，关于住宅建设。国家主要应该解决职工的集体宿舍，也可以建设一部分标准较低的公寓。同时，应该鼓励职工自建家属宿舍。职工家属宿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解决。城市职工宿舍的修建、管理、分配和租金等问题，是关系到城市建设和职工生活的重要问题，应该全面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同职工进行讨论，以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

第八，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再建设办公大楼、招待所、休养所和大礼堂。某些城市必须增加一些公共建筑和服务性的建筑（如学校、商店、医院、邮电局、旅馆、影剧院等等）的时候，也应该因陋就简，面向群众，合理分布。

第九，严格控制城市规划的规模，合理地降低城市建设的各项标准，节约投资，节约用地。在建设工厂和学校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原有的城镇。

第十，今后所有建筑安装单位，在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利用正式工程的建筑物，少建或者不建临时性的建筑物。在必须建设某些临时性的建筑物的时候，也应该只限于那些必要的工棚和现场性的加工场，一般地不再建设永久性的建筑基地。现有的永久性的建筑基地，在建筑任务完成之后，它的全部建筑物，包括办公、住宅、福利等建筑物在内，应该逐步地改作他用。

我们相信，采取上述措施，就可以在基本建设方面

合理地节约国家的建设资金，就可以用同样数量的钱而能够办更多的事，使我国的建设事业真正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向前发展。各位代表！

1957 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比较积极的和充分可靠的。这个计划在进一步地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条件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下，是可能超额完成的。根据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累计已经完成年度计划的 41.4%，比 1956 年同期增长了 11% 左右；几种主要的工业产品比 1956 年同期增产的数量是：电力 13.6 亿度，原煤 517 万吨，钢材 65 万吨，水泥 26 万吨。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状况，已经有所缓和。在农业生产方面，冬播作物小麦的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油菜籽的产量则比上年有较多的增产；春播、夏播作物的种植情况，一般良好；水稻、杂粮的种植面积都比上年扩大，而棉花的种植面积，则有所缩小；猪的饲养头数，也较上年有所增长。如果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可能完成计划。在基本建设方面，到五月底止，投资额累计已经完成年度计划的 25.1%，略低于 1956 年同期水平。在市场方面，供应市场的生产资料已有增加；消费资料，特别是副食品的供应，也开始有所好转。在交通运输方面，主要线路的紧张状态，也在逐步改善。总之，1957 年度的计划，过去几个月的执行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农业的收成目前尚难断定，还应该预防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工业生产中，有些产品的品种过少，有些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或者有些下降，还应该积极地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某些轻工业产品由于原料不足，在下半年的生产中还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特别是由于棉花不足，棉纱、

棉布的产量比计划还要减少。同时消费资料的供应，虽有某些好转，但少数商品仍然比较紧张；生产资料的供应虽有改善，但总的说来还感到不足。因此，全国人民必须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在力量，努力克服困难，加强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为全面地完成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为更多地、更好地超额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李政道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1926年，出生于上海

1943年，江西联合中学毕业

1943年，就读于浙江大学物理系

1944年，转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大

1946年，就读联大二年级，受吴大猷推荐赴美留学
(芝加哥大学物理系)

1950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至加拿大担任天文研究员

1951年，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

1953年，至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56年，与杨振宁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

1957年，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奖

1958年，与杨振宁、吴健雄同获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奖，并被授于普林斯顿大学物理荣誉博士学位

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

1961年，受推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63年，回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第一位「费米讲座」

的物理学教授偕夫人返回阔别 26 年的中国大陆

1964 年，和杨振宁受邀参加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二人还被推选为本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1984 年，回国参加第十六届中研院院士会议

1986 年，出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终身主任；并担任北京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主任。12 月，哥大为李政道举行六十大寿庆典

1988 年，在北京主持召开同步辐射应用国际讨论会。

李政道和杨振宁荣获 195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基于他们在 1956 年提出的“李-杨假说”——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这被另一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1912-1997）用实验所证实，从而推翻了过去在物理学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为人类在探索微观世界的道路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997 年 5 月 30 日，李政道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曾这样解释这项研究成果：“在物理学中，宇称守恒意味着左跟右是对称的。”“假如有两个系统，开始时互为对方的镜象，就是说它们的动态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左跟右不一样。宇称守恒是指，除了左右不一样以外，它们以后的发展应该完全一样。”“1956 年我和杨振宇在理论上建议了宇称不守恒。实验结果表明，宇称守恒的观点与自然现象是不符合的。”

1926 年 11 月 25 日，李政道出生于上海。他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抗战争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3年后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

在科学上早熟的李政道,1956年30岁时便升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亲身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因而在1974年5月30日会见毛泽东主席时,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的建议受到采纳。1979年他去合肥访问时去科大少年班看望了同学们,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李政道教授如今虽已年逾花甲,而且身体欠佳,但他的勤奋精神依然不减当年。继1957年和杨振宁教授一起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原理之后,20世纪60年代他又提出了“时间反演不守恒”和“孤粒子的量子化”理论,热心地倡导了“中微子实验”;70年代,他提出了重离子碰撞问题。他的这些创见,在理论和实验上对高能物理、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的发展都是不可多得的贡献。

与此同时,李政道长年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他建议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这些建议都一一得以实现。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85年,他在纽约与中国研究生相聚联欢时,讲了这样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今天我们有一切理由深深相信,中国科学家必然是”将来的主要人物。因此,你们必须共同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分享共同的目标和

理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此相聚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小资料

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稳固下来”。除个别情况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

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7年5月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从1957年5月15日起,中共中央先后3次发出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全国有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劳动。

世界部分

世纪回眸

国际偷渡公约签定

各缔约国，认识到通过协议确定有关偷渡的某些统一规定的合乎需要的，决定为此目的缔结一项公约，并协议如下：

第 1 条

在本公约中，下列名词具有下述特定涵义：

“偷渡者”，是指在任何港口或该港附近地点，未经船舶所有人或船长，或掌管船舶的任何其他人员的同意，而潜入船内，并在该船驶离上述港口或地点后仍留在船上的人。

“上船港”，是指在船上被发现的偷渡者登船的港口或该港附近地点。“离船港”，是指根据本公约的规定，该偷渡者被送交给岸上适当机构所在地的港口。

“有关当局”，是指由离船港口所在国政府授权，在该港内设置的、按照本公约规定接受和处理偷渡者的机构或个人。“船舶所有人”，包括光船租赁船舶的任何承租人。

第 2 条

(1) 在某一缔约国登记的或悬挂某一缔约国国旗的

船舶，如在任何航次中，在港内或海上发现偷渡者，除本条第(2)款另有规定外，该船舶长可将该偷渡者送交在发现该偷渡者后该船第一个挂靠的、且船长认为将对偷渡者按本公约规定进行处理的、位于某一缔约国的有关当局；

(3)在将偷渡者送交有关当局时，船长须向该当局呈递一份经签字的报告。报告中载明他所掌握的有关该偷渡者的一切资料，包括其国籍、登船港、被发现时的日期、时间和船舶的地理位置，以及该船的驶离港和随后挂靠的港口，连同抵达和驶离的日期。某一特定地点或在陆上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移动卫星服务中为移动卫星服务提供馈送环路(feederlink)的地面站。

第3条宗旨

第3条第(1)和(2)款由下列文字代替:(1)本组织的宗旨是为改进海上通信，并尽实际可能，为航空和陆上移动式通信以及不属海洋环境部分的水上通信提供空间段，从而有助于改进遇险与人命安全通信、空运业务通信、海上、空中和陆上运输的效率和管理的效率，海上、空中及其他移动式公共通信业务以及无线电定位能力。

(2)在本组织应尽力为海上、空中和其他移动式通信所需的各个区域提供服务。

第7条接入空间段

第7条(1)、(2)和(3)款由下列文字代替：

(1)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空间段应按理事会确定的条件开放，供所有国家的船舶、航空器和陆上移动地面站使用。理事会在确定这种条件时，应对各国的船舶或航

空器或陆上移动式地面站一视同仁。

(2) 理事会可允许船舶以外的设置在海洋环境作业的建筑物上的地面站和陆上固定位置的移动式地面站接入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空间段，但该地面站的工作对提供移动卫星服务不会有明显的负作用。

(3) 译注：中文意思不变。

在第7条中新增第(4)款：

(4) 在一国管辖下的陆地领土内移动式地面站使用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空间段，应以该国无线电通信管理规则为条件，且不会危及该国的安全。

第12条大会职能

第12条第(1)款(c)项由下列文字代替：

(c) 按理事会的建议，批准建立专门和主要提供无线电定位、遇险和安全业务的附加空间段设施。但是，为提供海上、空中和其他移动式公众通信业务而建立的空间段设施用于遇险、安全和无线电定位业务无须此种批准。

第15条理事会职能

第15条(a)、(c)和(h)款由下列文字代替：

(a) 确定海事、航空和其他移动式卫星通信要求，并为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空间段的设计、研制、建造、安装、购置或租用、经营、保养和使用，以及为满足这些要求获取任何必要的发射服务而制订政策、计划、规划、程序和措施。

(c) 制订陆上地面站、移动式地面站和海洋环境中建筑物上的地面站接入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空间段的标准

和批准程序，以及验证和监测接入和使用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空间段的地面站的运行标准的批准程序。对于移动式地面站的标准应十分详细，以供各国颁发电台执照的当局，按其旨意用于定型批准。

(h)确定与经理事会认可的代表船东、航空器和陆地运输经营人、海上、空中和陆上运输人员以及海上、空中和其它移动或通信的其他用户的机构进行经常性协商的安排。

第 21 条发明和技术情报

第 21 条第 (2) 款 (b) 项和第 (7) 款 (b) 项 (i) 目由下列文字代替：

(2)(b)有权向缔约国和签字者及任一缔约国所管辖下的其他人透露和已经透露此种发明和技术情报，以及免费在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空间段和与之在操作上有关联的任何移动式地面站或陆上地面站使用，批准和已批准缔约国与签字者及此种其他人有权免费使用这种发明和技术情报。

(7)(b)(i)如用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空间段或与之在操作上有关联的陆上地面站或移动式地面站，免予收费。

第 32 条签字和批准

第 32 条第 (3) 款由下列文字代替：

(3)一个国家在成为或在以后任何时候成为本公约的缔约国时，均可用书面形式通知文件保存人，宣布本公约适用于在其管辖下经营的那些船舶注册机构，适用于经其批准的那些航空器和陆上移动式地面站和适用于

在其管辖下的那些陆上地面站。

英美科学家完成核聚变试验

1958年1月24日，英美两国科学家成功地使两个轻原子相撞，产生了第三个更重的原子，从而产生更大的热量。这些原子温度上升到1亿度，也就是氢弹爆炸时的温度，便可产生核聚变。英国的约翰·科克罗夫特爵士和美国的刘易斯·斯特劳斯宣布了这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附：什么叫核聚变

利用核能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受控核聚变。裂变时靠原子核分裂而释出能量。聚变时则由较轻的原子核聚合成较重的较重的原子核而释出能量。最常见的是由氢的同位素氘（读“刀”，又叫重氢）和氚（读“川”，又叫超重氢）聚合成较重的原子核如氦而释出能量。核聚变较之核裂变有两个重大优点。一是地球上蕴藏的核聚变能远比核裂变能丰富得多。据测算，每升海水中含有0.03克氘，所以地球上仅在海水中就有45万亿吨氘。1升海水中所含的氘，经过核聚变可提供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后释放出的能量。地球上蕴藏的核聚变能约为蕴藏的可进行核裂变元素所能释出的全部核裂变能的1000万倍，可以说是取之不竭的能源。至于氚，虽然自然界中不存在，但靠中子同锂作用可以产生，而海水中也含有大量锂。

第二个优点是既干净又安全。因为它不会产生污染环境的放射性物质，所以是干净的。同时受控核聚变反应可在稀薄的气体中持续地稳定进行，所以是安全的。

目前实现核聚变已有不少方法。最早的著名方法是“托卡马克”型磁场约束法。它是利用通过强大电流所产生的强大磁场，把等离子体约束在很小范围内以实现上述三个条件。虽然在实验室条件下已接近于成功，但要达到工业应用还差得远。按照目前技术水平，要建立托卡马克型核聚变装置，需要几千亿美元。

另一种实现核聚变的方法是惯性约束法。惯性约束核聚变是把几毫克的氘和氚的混合气体或固体，装入直径约几毫米的小球内。从外面均匀射入激光束或粒子束，球面因吸收能量而向外蒸发，受它的反作用，球面内层向内挤压（反作用力是一种惯性力，靠它使气体约束，所以称为惯性约束）就像喷气飞机气体往后喷而推动飞机前飞一样，小球内气体受挤压而压力升高，并伴随着温度的急剧升高。当温度达到所需要的点火温度（大概需要几十亿度）时，小球内气体便发生爆炸，并产生大量热能。这种爆炸过程时间很短，只有几个皮秒（1皮等于1万亿分之一）。如每秒钟发生三四次这样的爆炸并且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所释放出的能量就相当于百万千瓦级的发电站。

原理上虽然就这么简单，但是现有的激光束或粒子束所能达到的功率，离需要的还差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加上其他种种技术上的问题，使惯性约束核聚变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尽管实现受控热核聚变仍有漫长艰难的路程需要我们征服，但其美好前景的巨大诱惑力，正吸引着各国科学家在奋力攀登。

艾森豪威尔签署《关于美国的中近东政策的决议案》

1957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对中东政策特别咨文》中提出：由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并可借口对付“共产主义侵略”，在中东地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两年内额外拨款4亿美元向中近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个决议案于3月7日被美国国会通过。3月9日，艾森豪威尔签署了这个后来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案。

当时，正值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失败，美国企图利用这个计划，一面以武力威胁为手段，一面以经济援助为诱饵，用反共作幌子，进一步排挤英、法等国势力，以实现其独占中东的阴谋。后来，艾森豪威尔主义也被用于中东以外的地区。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到中东各国人民的反对。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四国政府两度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1959年，随着国务卿杜勒斯的逝世，艾森豪威尔主义也黯然失色了。

从1953年到1961年，艾森豪威尔连任两届美国总统。他在任期间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宣布实行艾森豪威尔主义，还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了美苏高级会谈。“戴维营会谈”开创了冷战年代及以后的日子里美苏首脑会晤的先例。

艾森豪威尔是个戎马半生，战功卓著的美国总统。现代战争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和人才。要使各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而不互相摩擦、自我消耗，就要有人从中协调。艾森豪威尔在具体战役指挥上可能不如巴顿、蒙哥马利，但在协调各方面关系上极具才能。他以坚定、镇

静而又平等待人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信赖和支持。他还善于发现人才，所以蒙哥马利、巴顿、范佛里特等一大批名将，都能为他所用。

1943年底，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名他为盟军最高统帅，命令他发动以德国为目标的欧洲登陆战。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率军参加诺曼底登陆，受艾森豪威尔指挥，但他并不把美军将领放在眼里。在一次军部会议上，他竟对艾森豪威尔大发雷霆。艾森豪威尔一言不发，等他把话讲完后把手放在蒙哥马利的膝盖上，用低沉而坚定的语气说：“镇静些，蒙特！你不能对我这样讲话，我是你的上级。”艾森豪威尔指挥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他指挥了对德最后的攻势，并在兰斯举行的仪式上接受了德国的投降。

艾森豪威尔由于在二次大战中战功赫赫而被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

《罗马条约》签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美苏两国严重对峙的局面。美国凭借它在战争中增长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途径，力图全面控制西欧。而苏联则在东欧建立起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使西欧国家产生了担忧和恐惧。他们既不愿“成为大西洋一边的殖民地”，也不愿成为“乌拉尔一边的卫星国”。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许多西欧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大下降。要想不受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威胁，西欧各国只有走联合自强之路，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在国际舞台上扮

演一个新的重要角色。

美国与西欧有控制与反控制的一面，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西欧为了减轻防务开支的负担，并确保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求美国力量留驻西欧，而美国也需要借助西欧来抗衡苏联。因此美国鼓励和支持西欧联合。于是西欧国家相继成立了几个经济合作组织。1951年，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为实现西欧经济联合奠定了基础。

由于煤钢联营获得成功，上述六国的外长开会决定把煤钢联营推广到其他经济部门去，并成立一个共同市场。经过艰苦谈判，1957年3月25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上述六国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合称《罗马条约》），条约于1958年元旦起生效。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实现共同体内部工业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规定成员国共同的农业政策，筹组农业共同市场；制订共同竞争规则，消除各种限制和歧视竞争的协定和制度，设置一整套具有一定权限的共同体机构等。《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生效之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宣告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又称西欧共同市场）的建立是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的起点，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趋势，它对国际事务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年4月8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但3个组织仍各自存在，可以以独立的名义活动。

40 多年过去了，欧共同体成员国从 6 国增加到 12 国：英国、爱尔兰、丹麦、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陆续加入进来。1991 年 12 月，欧共同体 12 国首脑在马斯特里赫会议上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条约。1993 年 11 月初，条约生效，欧共同体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

小资料

1957 年 1 月 23 日，世界上第一台醉酒呼吸分析仪首次在瑞典投入使用，警察在街头用醉酒呼吸分析仪检查。